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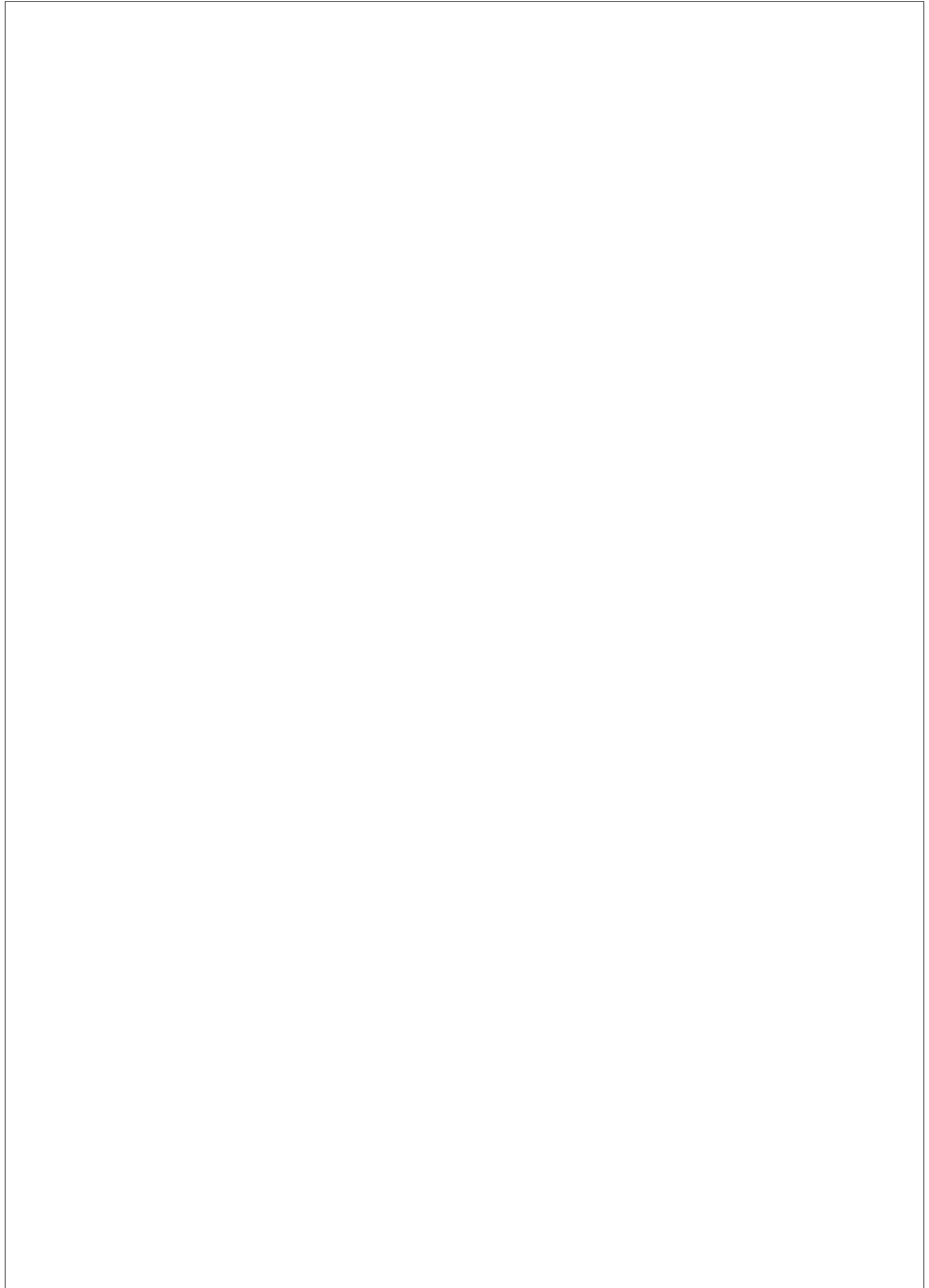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主 编：张冠梓

副 主 编：林建华 徐秀军 罗 婧（执行）

编辑部主任：罗 婧

编 辑：张书琬 赵晓航 郭云蔚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2025 年 6 月创刊

半年刊

第 2 辑

2 / 2025

目 录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逻辑体系” 笔谈

-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范式” 郑永年 / 1
-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多维视角 秦 宣 / 6
-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构成 黄建军 / 14
-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中国—阿根廷关系 拉米罗·奥尔多基 / 20

论 文

- “混合智能决策技术”驱动的行为涌现与社会仿真：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
新范式的机遇与挑战 侯博文 张润泽 / 26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
理性突围与实践路径 梁昊光 李 扬 / 45
- 城乡转型的中国特色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邓智平 岳经纶 / 57

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动因分析	赵西君 刘 雷 / 80
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反思	鞠 豪 / 96
英文摘要	/ 112

Journal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udies

Founded in June 2025

Semiyearly

Vol. 2

2/2025

Contents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Open-Source Paradig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Yongnian (1)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Qin Xuan (6)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Underpinn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ang Jianjun (14)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hina-Argentin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Ramiro Ordoqui (20)

Paper

Behavioral Emergence and Social Simulation Driven by “Hybrid Intelligen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u Bowen & Zhang Runze (26)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Liang Haoguang & Li Yang</i> (45)
The Chinese Path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Deng Zhiping & Yue Jinglun</i> (57)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Driver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Provincial Level	<i>Zhao Xijun & Liu Lei</i> (80)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Ju Hao</i> (96)
Abstract	(112)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范式”

郑永年

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具备全面性、全方位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是党在总结了中国自身经验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在不同时期需要找到相应的重点和突破口，但最终都必须走向全面和综合，任何单方面的改革开放都难以为继。

这一思维直接反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五位一体”表述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精准概括，也是对人类理想现代化模式的精深总结。这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否定，而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现代化（或者近代化）从西方开始，西方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但西方现代化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不平等”，即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和外部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内部的不平等是各国内部民粹主义的基础，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则是国家间民族主义的基础，两者的结合往往导致暴力和战争。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的选择，更是为西方反思自身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中国的发展经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参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西方

对中国经验的参照也同样重要。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之后向非西方国家扩散。西方过去的现代化缺乏自省，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然后向外推广，强加给其他国家。

现在，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其参照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尽管西方一些人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但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基于事实来正视中国式现代化。此前，西方式现代化被视为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尽管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曾经对西方产生影响，但这一模式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在“中国模式”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得到了有机结合，这既超越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也超越了西方过于强调资本作用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我们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经验中。通过一个比较的视角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的意义。迄今为止，概括地说，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以下五种主要的现代化模式。

一是西方现代化模式。这是最早的现代化模式，但对该模式需要作一个说明，因为西方那么多国家并不存在完全一样的模式。例如，英国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经验和后来的德法等国的现代化经验是不一样的。但因为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是现代化第一梯队成员，可以把西方视为一个整体。就现代化扩散而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闭源”。就内部发展而言，西方模式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无疑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早期。在现代化扩散过程中，西方有两种政策选择：第一，把自己爬上去的梯子抽掉，不让人家爬上去；第二，通过“帮助”他国发展来控制他国内部发展。这种范式我称为“闭源范式”。

西方的“闭源范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现代化本来就是经验和体验，但西方把现代化上升为意识形态，形成各种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现代化扩散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即西方把对外投资和贸易附加上很多条件，只有对方

国家接受了这些附加条件，西方才会开启投资和贸易。第三，西方相信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扩散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各种制度体系强加给他国，使得他国成为“西方式”或者“类西方”国家。第四，投资贸易的“工具化”，在“帮助”他国发展的同时，在各个方面控制他国。第五，一旦他国的现代化模式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构成挑战，西方就对其进行围剿，扼杀相关企业。

二是“体制外”依附模式，主要存在于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经济和治理结构上高度依附西方，在发展路径方面缺乏自主权力。尽管这些国家早期通过依附西方也获得了一些发展，但依附性发展制约着这些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它们大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经济体对西方的态度体现为两极，即极端的亲西方派和极端的反西方派，并且两派高度对立，没有妥协的空间。这些经济体内部，也呈现出意识形态方面极左和极右的对立，导致政局不稳，并且容易受外力影响。同样，社会也表现为两极化。这个对立的结构已经高度制度化，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很难突破。

三是“体制内”依附模式，以欧洲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最为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两件事情做得比较成功。一是马歇尔计划，二是针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策。美国在帮助这些经济体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控制了这些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呈现有“发展”无“独立”的局面。这些经济体大多是美国的联盟或者准联盟成员。在经济领域，一旦这些经济体在某些方面开始超越美国，对美国构成所谓的威胁，美国也照样打压。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法国和德国的打压就是典型例子。在实践中，美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市场开放的确帮助这些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缺乏独立的主体性导致独立思考的缺失。一旦美国不再重视所谓的传统盟友体系，这些经济体就受到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不知道未来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四是“体制外”独立模式，以苏联、古巴和朝鲜最为典型。这些国家一直努力追求现代化，但一直处于和西方“脱钩”的状态。有主动“脱钩”的，也有被动“脱钩”的。具体来看，尽管这些国家保持了独立，也想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现代化，但始终面临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不充分或不可持续，很多领域远未达

到现代化水平。

五是“中国模式”。正如党的二十大所总结的，“中国模式”表现为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意义上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主观意义上的正确政策选择。概括地说，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开源范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原则是“以人为本”。可以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穷则独善其身”指向内部事务，当国家穷的时候，需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穷，如何摆脱贫穷状态。“达则兼济天下”指向外部事务，当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就要思考如何去帮助别的国家也得到发展。在一国内部，如果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过度分化，那么不仅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当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国际社会就会过度分化，不仅贫穷社会很难实现发展，富裕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启示

中国五位一体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实际上，人是理解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是否会成功的最佳视角，正是因为人，现代化才具有了意义。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文化的多样性，而文明、文化的多元多样性又决定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中国的成功在于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向类似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而且也向类似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学习。但不管如何，我们不会照抄照搬。我们有选择地汲取和修正这些实践经验以使其符合我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符合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大概率都会成功，否则大概率会失败。自然，这也是在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训之后才有的经验。

同样道理，在国际层面，我们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样本，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可以参考和有选择地效仿我们的模式，以符合他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只有这样，这些国家才会走向成功。学习、修正、再学习、再修正，这就是现代化的“开源范式”，也是人类进步的动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在实现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这是中华文明的本质，也

是中华文明的使命。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赵晓航）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 体系的多维视角

秦 宣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共同追求。纵观人类现代化史，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不一样，道路选择也不一样，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也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终于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其背后必然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独特的价值观引领、宝贵的经验启示、优越的社会制度保障。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价值观、经验、制度到底是什么？这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必然是多层次、多维度、多视角的。我们要从多个维度探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核心观点，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第一，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再到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

伟大社会革命，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而为实现现代化扫平道路，创造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也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步骤的制定、战略重点的选择、战略举措的实施，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遵循现代化规律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的实践探索、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之中。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应该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形成的理论成果，必须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现代化思想。

第二，从现代化的性质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人类自迈向现代化以来，相继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类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几乎都是建立在对外殖民掠夺、对内剥削人民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基础上的。十月革命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开启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在中国，关于现代化道路问题，一直颇有争论。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力主“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均未成功。毛泽东根据 20 世纪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中国现代化屡次受挫的深刻教训，明确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出路在于，经过民主革命，然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寻找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①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既能避免现代

^① 秦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学与研究》2022 年第 10 期。

化进程中出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罪恶行径,又能集中优势发挥能动性,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合理的发展;之所以能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①,就在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也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是寻求人类解放的事业,也是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事业。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对外暴力掠夺殖民地、对内残酷剥削人民的道路,是以造成其他国家落后和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③

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制度等核心概念与范畴纳入其中。

第三,从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现代化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和根本动力,也是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④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始终面临人口规模巨大与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带来的压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巨大、地区发展水平悬殊,在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282页。

② 秦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569~570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594页。

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人的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将实现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将全心全意依靠人民作为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特征。这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而忽略人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另一个鲜明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人民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积极主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重中之重，使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温饱”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小康”，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现代化、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作为重要指标。为此，必须考察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必须总结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第四，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赶超型现代化，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考虑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和优势。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中国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为克服重大危机才艰难地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这比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如英国、法国）晚了近 200 年。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短板明显、优势突出。中国现代化起步比较晚、底子十分薄弱，这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矛盾与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也世所罕见。但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它可以借助发达国家产生的示范效应，形成现代化的动力；可以吸取先发现代化国家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而极大缩短探索历程；可以学习借鉴先发现代化国

家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和宝贵经验;可以借鉴和采用先发现代化国家比较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从而在一定阶段实现经济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现代化的过程是“并联式”而非“串联式”的。西方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①西方国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依次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西方国家先解决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再解决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问题,最后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困难和矛盾构成一个复合体。这就意味着,后现代化国家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将更加艰辛,代价将更大。

三是现代化是赶超式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想迅速实现现代化,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赶超战略。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诞生的一系列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都先后制定了赶超战略,但绝大多数国家由于脱离本国实际没有取得成功。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少有的例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中国的成功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了一条新路。^②

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既必须结合后现代化国家的共有特点,又必须体现中国的独特贡献。

第五,从现代化的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社会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构想未来美好社会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24~25页。

② 秦宣:《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的多维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发展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再到协调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从抓社会的全面发展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把现代化看作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关注物质文明而忽视精神文明的弊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也为世界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①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考虑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一鲜明特色。

第六，从世界现代化的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既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能离开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共同的追求。世界现代化浪潮由西欧、北美向亚洲等其他地区扩散，是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在这一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世界现代化运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历经与封建主义复辟势力的多次较量

① 秦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0期。

之后才进入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的。紧随其后的美国、加拿大等国新兴资产阶级推动的现代化也基本是仿效英国、法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虽然走的是与西方现代化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比如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绝不是“中国特殊”,更不是“中国例外”。

因此,我们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不能脱离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相反,我们应该将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宝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将个性上升到共性,将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只有这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才能在世界现代化理论图谱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对世界现代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七,从现代化的文明形态看,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因此,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形态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① 同时他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② 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获得两点启示。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六观”就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许多概念范畴也直接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小康”。因此,我们不能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不是单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而是世界性进程。现代化有其自身规律,任何国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符合现代化一般要求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向前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能离开人类文明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秦宣，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赵晓航）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的逻辑构成

黄建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本源、政党领导、根本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策略、推进方法和世界意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谓”与“何为”、“谁为”与“为谁”、“何如”与“如何”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围绕“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等问题全面展开，但同时也存在主题重叠、阐释重复、概念重合、观点堆砌、文风雷同等研究“瓶颈”。同时，2023年12月2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这个重大命题。^①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规律？如何总结这些规律？如何从规律中发现问题？实际上，这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规律”与“逻辑构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何谓规律与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有其规律和逻辑。”^②历史是规律与逻辑的载体，事物的规律是通过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而得以呈现的。规律反映了事物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逻辑是对思维规律的反映、概括、总结。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第103页。

^②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2页。

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思想进程”本身就表现为逻辑形式，而逻辑形式的起点与历史的起点具有内在一致性，逻辑揭示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就是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表现。

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看，逻辑构成是一种基于逻辑方法的考量，是用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方式建构的理论体系，这主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思维概括和反映。历史的方法是按照历史发生和发展的自然行程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揭示其内在规律的思维方法。从逻辑与规律、逻辑与历史的方法论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构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历史发展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社会建设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人的发展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必然。

一 历史发展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

从宏观上划分，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逻辑规律（或者思维规律），自然规律是关于自然的必然性、本质性联系的规律；社会规律是社会历史及其事件之间固有的和本质性联系的规律；逻辑规律是关于观念和思维的本质性和必然性联系的规律。自然规律重在揭示事物的“向真”逻辑，社会规律重在揭示社会历史的“向善”逻辑，逻辑规律重在揭示观念或思维的“向美”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规律在现代社会的彰显。历史发展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

历史规律决定了现代化的生长点，确证了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历史规律来看，现代化源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过程之中，体现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同时也开创了世界现代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6页。

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强调“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①，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②，最终“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所以，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下，现代化真正具备了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型工业引发了商业革命，继而引发了社会革命。其内生逻辑依然是以马克思提到的“现代生产方式”为逻辑起点和逻辑标识的。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其逻辑起点不是承接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而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西方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塑造的现代 society。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在社会发展规律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属于“高阶起点”，是打破西方现代化的经典版本和经典方案后形成的“非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按照“工业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殖民扩张→外溢扩散”的霸权逻辑展开的，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基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按照“政党领航→自觉探索→自主设计→人民合力→自立自强”的和平发展逻辑展开的。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既契合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 社会建设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

社会建设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体现，是历史规律在社会生产生活层面的具体展开。历史规律是普遍性规律，社会规律是特殊性规律，但在社会规律中又蕴藏着更为特殊的规律，比如经济规律、政治规律、文化建设规律等。社会规律归根到底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的人的社会实践规律和活动规律。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71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摆脱了资本逻辑宰控的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①“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表达。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全面展开和实践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社会规律在社会主义形态中的彰显，这一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统筹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运行和治理规律、改革发展稳定的规律等。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的、文明底蕴、内生动力等基本要素的实践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源头上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社会建设规律在社会主义形态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形态上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表现为政党领航、思想指引、民族特色、道路性质、路径原则、战略策略等多个维度。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体系，它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本源，这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策源地”，它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方位问题。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根魂，这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承续和思想底蕴，它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旗帜问题。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体，这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它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问题。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特征，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民族特色和实践要求的概括，它通过“五个中国特色”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风格。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要求的概括，实际上，“九个本质要求”共同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确证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遵循。第六，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原则，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贯通路径和并联模式的概括，习近平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0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368页。

总书记概括的“五项重大原则”和“六个重大关系”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原则和方法。第七，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价值，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原创性贡献和世界历史意义的概括，它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问题。

三 人的发展规律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必然

人的发展规律就是人自身的规律，是基于人的逻辑的规律，它不同于物（资本）的逻辑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① 西方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适应了人的发展逻辑，是人的逻辑的根本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就体现为“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

从人的发展规律看，马克思把这一规律细化为三个阶段，即把人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三个阶段^②。这三个阶段概括了以人为坐标主轴的社会跃升逻辑，内含以人为目标的发展价值。在人的发展规律中，现代化深刻表现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超越，是从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否定性中逐渐萌生起来的。而现代化真正的逻辑起源是“物的依赖性”及其关系的彰显，即人类现代化最早的逻辑起点在人的发展阶段上表现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超越和对“物的依赖性”及其关系的生成，体现为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现代社会的真正彰显。但是，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它的人本逻辑生成是基于人类从“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的必然性发展。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超越了“物的依赖性”逻辑（资本逻辑），彰显了“自由个性”逻辑（人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的发展规律中实现了对物的逻辑的破除，正在为人类通往“自由个性”开创新的必然性。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并朝着“自由个性”的逻辑必然性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64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①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 14 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② 把人民至上、人民美好生活作为价值主体,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必然,真正体现了人类现代化的未来之路。

〔作者黄建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晓航)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2页。

②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8页。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 中国—阿根廷关系

拉米罗·奥尔多基

新时代阿根廷有必要以全力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并进一步拓展国际经济关系。任何旨在通过合作增强阿根廷国家凝聚力的外交政策提案，都必须立足于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思考如何在动荡且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以有利于阿根廷国家利益的方式在决策中心获得地位。这一原则要求阿根廷始终重视国际行动的战略价值，以把握世界主要地区的基本情况为决策前提，并避免基于意识形态的驱动而作出外交决策。

然而，当前仍存在某些论调试图推动所谓“新冷战”叙事，错误地将阿根廷基础设施融资中涉及的 200 亿美元缺口归咎于中国。实际上，该问题应归因于对“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参与方式以及对中国建交国准入条件的处理。

我们确信，尽管那些在新的多极世界中寻求自身利益的群体会发出不同声音，并且争论的时间会很漫长，但通过参与能够带来积极成果的选举与制度机制，相关群体仍可有效推动变革。除此之外，自 1972 年建交以来，阿根廷与中国已有 53 年稳固的双边关系，这一关系超越了阿根廷国内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因政府更迭而动摇。阿根廷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此项传统应继续推动中国和阿根廷迈向务实合作，而非屈从于不实的幻想与误导性言论。

在此背景下，值得思考的是：在经历数十年的国际格局变迁之后，阿根廷应如何准确理解并定位与中国在新时代的关系？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南方

近年来，中国通过降低关税刺激内需、扩大航空领域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并提

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自正式提出并提交联合国大会（UN-GA），已走过十余年历程，其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2025年5月9日王毅外长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Group of Friends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部长级会议暨国际研讨会期间宣布，中国正与国际社会一道促进共同繁荣，支持发展中国家，并开展互利合作，而这一倡议正激励着一些发展中国家激活自身资源，发挥作用。在欧洲，王毅外长通报了中欧班列达到10万列的成就，还提到了新近启用的钱凯港（在秘鲁，是连接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个基础项目），并回顾了135个国家已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这一事实，而阿根廷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王毅外长所说的，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单方面延长签证有效期、对38个国家实行过境免签政策，以及加入《亚太贸易协定》（APTA），同时还向保持零新冠病例的较不发达国家提供疫苗援助，这些举措得到了相关国家的高度认可。

在经历诸多考验之后，阿根廷是否已做好准备推行有利于阿根廷人民与其发展的外交政策？我们要摒弃偏见、保持客观，就必须承认中国贡献了全球约30%的经济增长，并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面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的目标，世界银行也持相似预期。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①

这些客观数据不会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尊重，也不会减损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减贫成就的认可——中国在数十年间使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人类共享的重要实践，并且中国始终在与各国合作与交往中践行这一理念。

二 拉丁美洲的国际地位重塑

在此过程中，拉丁美洲对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程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1月1日。

过去几年间，此类项目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条地铁线路的建设、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的改造，以及近期在秘鲁钱凯港推进的大型工程等。

对此，王毅外长指出，近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该地区诸多行业的持续发展。这些合作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就业岗位，还有效优化了商业环境，吸引了更多外国投资。

事实上，这一点在哥伦比亚当局的回应中迅速得到了体现。该国的贸易、工业和旅游部长参加了 2025 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并在会上强调，地理距离不应成为阻碍；旅游业及其他行业应致力于增进对彼此商品的了解，从而推动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24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巴西举行之际，巴西学者佩德罗·斯腾哈根（Pedro Steenhagen，中文名为石昊）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显示出强劲韧性。石昊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①

这一观点也与部分分析人士的考量一致。他们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进口产品关税政策，及其以移民政策为由威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做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比，从而凸显出两者在国际合作理念上的根本差异。

三 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在此背景下，环境保护问题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中国为构建更宜居、更公正的世界付出了巨大努力。正如丁薛祥副总理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2024 年 11 月于巴库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期间所强调的，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现了坚定承诺。^② 中国致力于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已提前

① 《巴西学者：中国为他国现代化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41119/t20241119_52698141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② 《丁薛祥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114/84b52267c48b4361a087fc98e0b41245/c.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达成部分阶段性目标。

中国在多个领域经历了深刻转型，涵盖能源结构优化、气候治理强化以及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引领。目前，中国已成为硅片、硅锭、电池片及太阳能组件等关键光伏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这些产品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技术支撑。

中国强调，那些践行绿色发展的企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还将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广至世界多地。例如，甘肃敦煌太阳能园区及该省同类项目，作为中国绿色技术的代表，已落地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胡胡伊省考查里太阳能公园，是拉丁美洲同类型最大的光伏站。

需要指出的是，阿根廷与相关国家合作中许多重要里程碑，均与推动可持续能源转型密切相关。已完成的项目如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总统水电站，以及正在推进的若昂·库韦德斯太阳能园区扩建工程，都是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绿色发展的具体体现。

四 技术、创新与促进发展的专利

还有一种针对中国的常见不实论调，是将中国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所谓“对知识产权根本性不尊重”相挂钩。对此，阿根廷外交部长明确指出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展现出高度的合作意愿。中国早在 1994 年就已加入《专利合作条约》(PCT)。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强国，通过 PCT 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从 1994 年的 98 件，发展到 2023 年的 69610 件。^①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了专利增长的双向互动。2013~2022 年，中国申请人在 50 个共建国家提交专利申请，这些国家累计公布中国专利申请 6.7 万件，授予中国专利 3.5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达 25.8% 和 23.8%；同时，115 个共建国家在华提交专利申请 25.3 万件，获得专利授权 11.2 万件，年均增速分别为 5.4% 和 9.8%，较同期在华外国专利申请

^① “China’s 30-year journey to becoming powerhouse in international patents”, <https://english.news.cn/20241226/e784485cae074a81aef7d2cf50d137f/c.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量与授权量总体增速分别高出 2.9 个和 5.6 个百分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专利申请数量为 25.3 万件，增长率为 5.4%。^①

此外，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在遏制非正常专利申请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近年来实施的更严格立法也刺激了国外专利申请的增长。截至 2024 年 6 月，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和有效注册商标量分别达到 91.9 万件和 213.5 万件。这一进展使中国得以与 80 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联盟。^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丽莎·乔根森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加入《专利合作条约》（PCT）30 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30 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进步，来自中国的申请量连续 5 年位居 PCT 申请量榜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 PCT 申请超过全球总量的 1/4，涌现出一批 PCT 申请量名列前茅的中国申请人。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③

事实上，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理念多年来一直指引着中国的行动。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已逐渐摒弃陈旧对抗性论述，转而更多采用倡导共同价值、推动合作共赢的话语方式进行国际交流。

然而，当全球范围内发生如此深刻变革之时，阿根廷却一再将其外交政策狭隘地局限于国内政治利益的考量中。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阿根廷的国际能见度，更浪费了宝贵的机遇。而本该用于推动和扩大国际经济关系的宝贵窗口，正因此逐渐缩小。

贸易往来与良性外交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具备国际经验的国家深知，企业所

① “A Patent Statistics Report of 10 Years (2013–2022) Covering China and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Recently Released”, <https://www.unitalen.com.cn/html/report/23111498-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② “China’s 30-year journey to becoming powerhouse in international patents”, <https://english.news.cn/20241226/e784485cae074a81aeff7d2cf50d137f/c.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③ 《中国加入专利合作条约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京举办》，http://cnipr.com/sj/zx/202410/t20241022_256065.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

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追求利润，更在于成为一国在海外的“非官方大使”。换言之，若企业不能理解一国的外交政策导向，便难以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它将无法洞察世界动态，特别是关键行为体的战略动向，因而也难以基于国家利益采取有效行动。

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但要共同构建更美好的世界，它势在必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的是理解的能力与务实的态度。

〔作者拉米罗·奥尔多基，阿根廷企业及地方政府国际关系独立顾问，埃塞萨省立大学教授，阿根廷经济部前国务秘书，阿根廷外交部前副国务秘书〕

（责任编辑：张书琬）

“混合智能决策技术”驱动的行为 涌现与社会仿真：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治理新范式的机遇与挑战^{*}

侯博文 张润泽

摘 要：随着大语言模型（LLM）技术的迭代升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前沿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辅助工具”向具备模拟能力的“代理智能”演进。与此同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从技术进步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从大数据时代到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范式革新相关议题。不同于通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混合智能决策技术”正凭借其自身优势在行为涌现与社会仿真上表现出惊人的能力。在区域国别战略仿真、宏观经济决策、关键产业安全预警、社会模拟革新、军事社会学转型五个领域，“混合智能决策技术”借助新型决策基础设施呈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范式和新机遇。深刻理解和把握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范式革新，对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混合智能决策技术

引 言

纵观过去 70 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既具有人类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战略科技市场的制度机理与优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BSH077）的阶段性成果。

呈现出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特色。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也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进而深刻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的过程与事业。

时至今日，科技创新更是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随着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技术的迭代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辅助工具”演进为具备社会行为模拟能力的“代理智能”，并深刻重塑着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与运行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①此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重磅文件陆续出台。2025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②可见，党中央正在加速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擘画“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即以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牵引，以制度文明演进为根基，最终建成具有前瞻性、适应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在国家战略加速布局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疑为国家治理开

① 习近平：《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18年10月31日），载《论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214~215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人民日报》2025年4月27日，第1版。

启了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新篇章。然而,智能社会的海量数据、异变场景与新型风险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仅国家治理理论面临解释力度降低的窘境,国家治理实践也经受了反馈迟滞抑或效果异化的困局。不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却又凭借其强大的模拟能力构建了“硅基试验场”,解决了政策前瞻性不足和风险研判不准等一系列痛点。被赋予真实社会属性的硅基智能体不仅可以模仿人类个体的认知和决策,还可以遵循社会规则(包含明确规则和不成文的潜规则)呈现多主体间的互动行为,甚至能够模拟和预测群体行为涌现出的社会变迁趋势。换言之,具有仿真能力的“混合智能决策技术”“数字孪生社会”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能力与体系”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在此背景下,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驱动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革新,不仅是亟待回应的重大理论命题,更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的重大实践课题。

一 多学科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脉络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工智能时代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领域,研究灵感也广泛地来源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经典议题。其一,政治学一直以来都对国家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高度关注。那么,当下如何深入挖掘数字技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正向作用,避免政府在智慧治理时代大潮下掉队便是其重点关注的方向。其二,在数智时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视域下,效率与动力议题仍旧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为了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后的经济驱动与挑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资产配置规则与效率、平台经济的潜在垄断风险等也成为该领域的前沿问题。其三,社会结构潜在的剧烈震荡再次唤醒了本就诞生于“大转型”时期的社会学。人工智能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社会结构转型、社会风险酝酿和社会生活方式变迁带来了远别于工业时代的震撼,也让有关数智时代的“社会公平、伦理价值和民众福祉”研究更具学科旨趣。其四,跨学科领域自诞生以来便展露其在国家治理上的独特优势。具体而言,这种优势集中体现在治理数据分析能力提升、治理技术手段迭代升级、治理体系优化创新等方面。而在这些变化中,面对智能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新现象和国家治理新难题,得到技术加持的传统社会科学领域国家治理理论与方法迎来了新时代的价值定位。总而言之,相

关研究均从各自所长出发，着力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框架。

（一）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的演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速，原有“统治”型权力日渐过渡到多元参与的“共治”型治理，从封闭到开源、从单向度到共通性、从独立到协同的三重转变也日渐显著。进入数智时代，新技术在理念体系、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与政策工具四个维度上带来了系统性重塑。数字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治理模式的异变，强化了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性。数字革命在“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条进路上，不断形塑着权力运行过程中对公开性、透明性与回应性的制度追求；并且大大推动了治理模式朝着“智慧化、协同化与精准化”快速发展，构建更具适应性与创新性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①

二是技术导向与公共治理。当下，多维度、异构性的海量数据为系统性决策提供了价值十足的依据。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公共治理的效率，大语言模型智能体更是强化了治理的涌现性和可预测性。换言之，“生成式治理”通过全域数据感知、跨域知识萃取、多情景策略创生，正在对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已有逻辑进行系统性重构。这也让公共治理合法性从传统的制度设计和宪法程序，慢慢转向依赖实际治理效能以及多元参与主体的敏捷响应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恰恰善于通过数据喂料、算法迭代和模型精调，推动专业化的技术治理走向通用性的公共事务治理。然而，“技术迭代+公共参与”模式也蕴含了潜在的“技术决定论”的治理风险。算法不透明、不可溯源的自动化决策机制、责任模糊状态等问题悬而未决，它们都有可能反过来侵蚀公共治理合法性的技术构建路径。^②

三是军事冲突和国家安全。新一代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影响军事冲突的烈度，甚至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体的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凭借其处理海量数据和仿真的能力逐步融入了战争决策之中，俨然在军事冲突决策中扮演了首席分析师

① 高奇琦：《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② 米加宁：《生成式治理：大模型时代的治理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的角色^①。然而,围绕战争议题获取的情报数据充满了欺骗与对抗,即使是精妙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也可能建议升级对抗行为,用以捍卫其被赋予的国家安全绝对保障的尊严。^②换言之,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技术应用俨然已从战术层面延伸至战略决策,形成“技术—政治”的双重博弈格局。这就凸显了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对人工智能开展有效管控的必要性,以及技术迭代带来的“赛博格伦理”问题。^③

(二) 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技术、市场与创新的关系。经济学公认的“五代创新范式”理论认为,创新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聚焦到科技创新上,其发展主要源于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交互作用。进入新时代,数据洞察力和理论逻辑能力交互耦合后形成了驱动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海量规模的个性化数据奠定了创新链条当中大型平台的显著地位,进而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形塑了创新发生的组织形态。不仅如此,数字经济用“开源而不是闭源、共享而不是独占”的创新理念推动了技术、市场与创新关系的转型升级。^④

二是数字经济的挑战与治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经济治理挑战,例如平台垄断、数据安全、算法歧视以及大型数字平台在全球经济中的权力集中及其对传统市场秩序的影响^⑤。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在数据“双循环”中形成结构壁垒和生态垄断,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这需要政府在反垄断和公平竞争方面加强监管,以维护市场活力和消费者利益^⑥。

① Toni Erskine and Steven E. Miller, “AI and the Decision to Go to War: Futur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2, 2024, pp. 135–147.

② Sebastian Elbaum and Jonathan Panter, “Managing Escalation in Off-the-Shelf Large Language Models,”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508.01056>, 1 Aug. 2025.

③ 李贝雷:《人工智能嵌入国家安全的应用场景、潜在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23年第4期。

④ 江小涓、官建霞、李秋甫:《数据、数据关系与数字时代的创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⑤ 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⑥ 张严:《生成式人工智能垄断风险问题探析》,《科学决策》2024年第9期。

三是经济异化与全球治理。当人工智能产业嵌入业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时，新一代技术极有可能引发新型的“经济异化”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平台经济的超强虹吸效应，利润和剩余劳动价值可能会加速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形成比工业社会更具资源汇聚能力的新型的数字殖民形态。^①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非均衡扩散使数字鸿沟扩大化、数字领域风险正从个人隐私泄露向国家主权安全升级跃迁，加之共同的数字贸易规则“供给赤字”，亟须实现全球数智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更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致力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与话语权。^②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变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通常伴随着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其中，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转型更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人工智能从技术结构特征和治理结构特征出发，对社会秩序及其生成机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技术能力高度集中、管控高度集权、商用者高度垄断、使用者高度分散的社会后果。这无疑会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网络社会等时代截然不同的巨大变化。那么，通过确立和强化政府、企业与劳动者责任，加强网络监测与情报收集，重塑教育与人类理性等方式，力争塑造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良性协调运行秩序便是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③

二是数字社会中的风险预警与舆论治理。借助新媒体平台，社会动员与舆论传播的负面风险与日俱增。通过及时性和真实场景传递的方式，让原本难以瞬间共情的集体认同和情感塑造变得触手可及。^④在众多的新技术中，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度伪装（deep fake）更是带来了舆论操控和虚假信息传播风险的指数级增

① Petter Törnberg and Justus Uitermark, *Seeing Like a Platform: An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 Moderni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25, p. 4.

② 史丹、聂新伟、齐飞：《数字经济全球化：技术竞争、规则博弈与中国选择》，《管理世界》2023年第9期。

③ 郑永年：《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4期。

④ Ori Schwarz, *Sociological Theory for Digital Society: The Codes that Bind Us Together*,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2021.

长。^① 作为非人类的技术行动者,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已然成为社会风险的叙事主体登上历史舞台。^② 未来,智能社会中的风险治理理论亟待得到系统研究,风险治理的手段与实践更需要得到“政府、社会、企业、行动者”等多个主体的高度重视。^③

三是技术伦理与“技术向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复杂的伦理问题,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责任混淆等。未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赋能型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不断提炼智能向善、包容审慎、敏捷治理、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理念,进而建设以法治为核心的赋能型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在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技术向善的价值导向和伦理关怀。^④

(四) 跨学科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2009年,大卫·拉泽尔(David Lazer)等人指出,当下正步入一个以大数据和算法模型为核心驱动力的计算社会科学时代,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转换上,更表现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变革。^⑤ 2021年,大卫·拉泽尔等人进一步指出,21世纪人类社会行为的观察和测量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大部分行为都可以被量化和分析的前提下,采用新的方法收集和使用以上数据俨然成了计算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方向。^⑥ 同一年,米尔塔·加莱西克(Mirta Galesic)等人指出,面对当下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如何通过大数据和新模型来挖掘隐而不彰的事实,进而理解和应对复杂的社会现

① 黄日涵、姚浩龙:《“再塑造”与“高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舆论安全的影响》,《情报杂志》2024年第4期。

② 崔中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的社会风险及治理》,《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③ 苏竣、宋立夫、魏钰明等:《智能社会的舆论操控:理论机理、手段特征与社会影响》,《电子政务》2025年第1期。

④ 张吉豫:《赋能型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确立与机制构建》,《中国法学》2024年第5期。

⑤ David Lazer, Alex Pentland, Lada Adamic, et al.,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Vol. 323, No. 1, 2009, pp. 721–723.

⑥ David Lazer, Eszter Hargittai, Deen Freelon, et al., “Meaningful Measures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ature*, Vol. 595, 2021, pp. 189–196.

象变得至关重要。^①

二是个体模拟、场景模拟和社会模拟。近年来，大语言模型智能体凭借模拟和复现人类行为的能力，逐渐奠定了其未来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研究范式革新方法的基础地位。与此同时，基于大语言模型智能体开展的仿真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个体层面的行为模拟，即通过真实世界的个体特征来厘定个体行为模拟的边界和阈值，进而呈现较为可信的精细化建模；二是场景模拟，加入价值理念和群体动力机制的互动行为模型，用来预测群体的社会心态和集体行动倾向；三是社会模拟，借助多智能体技术来展现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涌现性。^②

二 混合智能技术驱动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超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多变性始终是悬在传统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们往往绞尽脑汁才能稍稍应付。凭借有限经验的治理决策常常难以解决信息碎片化、决策流程冗长和风险评估不及时等问题，这也制约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效能的充分发挥。当前，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维度：一是产业全球化分工塑造的世界体系面临地缘博弈逆流，外部国际环境对一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二是新一代技术发展深刻改变了“生产、劳动与分配”的基本逻辑，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迎来了颠覆性变革。

有鉴于此，现阶段的国家治理面对“多场景、多要素、多主体、多数据、多风险”的复杂局面，势必要进行跨领域、跨学科、跨层次的系统性分析和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跨学科知识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等技术为应对这一变化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和可行性路径。首先，借助自主式知识发现和机器学习技术，治理主体可以

① Mirta Galesic, Wändi Bruine de Bruin, Jonas Dalege, et al., “Human Social Sensing is an Untapped Resource for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Nature*, Vol. 595, 2021, pp. 214–222.

② Xinyi Mou, Xuanwen Ding, Qi He, et al., “From Individual to Society: A Survey on Social Simulation Driven by Large Language Model-based Agents,”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412.03563>, 4 Dec. 2024.

简洁高效地获取实时更新、多模态以及可编码的第一手数据，这将极大地提升复杂社会中有效信息的获取与感知能力。其次，通过大语言模型驱动专业小模型（包含面向国家治理真实场景的外生变量、社会科学理论与统计模型）的新方法，不仅提升了智能决策的专业性和敏捷性，更解决了单纯使用大模型或垂类大模型可能带来的信息“幻觉”问题。不仅如此，混合智能决策也极有可能成为深度人机协同的可行性技术路线，进而从识别潜在危机、模拟政策影响的角度出发，不断地提升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稳健性与前瞻性。

（一）基于新型决策基础设施体系的国家治理范式创新

1. 新型决策基础设施体系

所谓新型决策基础设施体系，是指在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用以支撑国家在关键战略行为中高效搜集信息、精准模拟预测、科学设计对策和动态评估选择的核心技术系统与组织模式^①。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系统或数据库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集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跨学科理论模型以及基于人类真实反馈的超复杂人机协同网络。其核心特征在于能够将分散、异构、多模态的数据实时转化为结构化、高信噪比的决策信息，进一步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式加速知识的发现与理论的创新。最终，通过多迭代、高保真的仿真推演为战略决策提供动态、多维、可解释的优选方案。

无论从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来看，还是从国家治理的中国实践创新出发，构建从微观行为到宏观社会模拟的新型决策基础设施，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将起到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基于多学科理论的知识加工体系，形成不同于数据标注的专业领域知识底座，为国家治理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可靠信源和理论创新空间。其二，依托大语言模型技术和多智能体协作体系，提升处理数据和知识加工的信度与效度，及时可靠地开展宏观监测、风险预警和政策模拟，实现依托可信数据的辅助决策判断。其三，采取“混合智能决策技术”路线，依托“可靠专家+可靠信源”评估体系的深度人机结合，给出可溯源、可验证的国家治理战略决策方案。具体的新型决策基础设施运作逻辑如图 1 所示。

^① 张树辉、王震宇、张润泽：《以智慧决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1 月 1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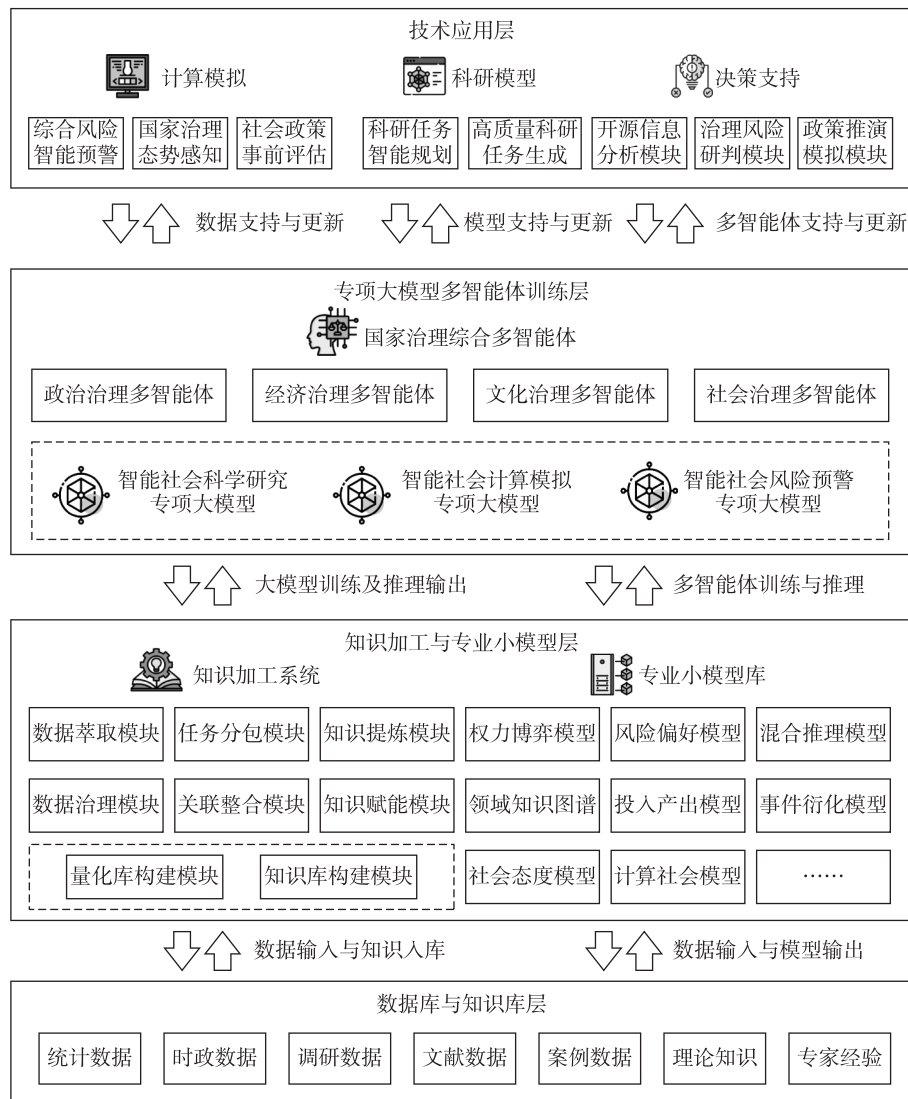


图1 新型决策基础设施运作逻辑

2. 混合智能决策

混合智能决策是一种集“知识加工—智能研究—战略决策”于一身的高度整合型技术路线。其核心在于“混合智能”这一理念，具体表现为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与垂直领域小模型相结合、多源变量融合以及人类专家与机器智能的深度协作，共同服务于复杂宏观决策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该方法既不单纯依赖大模型的强大计算与泛化能力，也不局限于专家系统或专业模型的可解释性与可靠性，而是致力于将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智能要素进行系统性集成，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有机整体。

第一，知识加工环节。该环节构成决策智能化体系的基础，其核心任务在于借助预先设定的推理规则，将海量原始数据（包括卫星图像、社交媒体信息、新闻报道、政策文本、统计数据以及大型调查数据等多源异构信息）自动转换为结构化、高信噪比的知识变量。例如，系统能够从遥感影像中识别城市动态，并将其转化为结构化的“城市态势”指标。这一过程显著提升了多模态数据在决策中的可用性，并为后续计算分析的高效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智能研究环节。在此阶段，系统将开展假设检验、预测模型优化、分析研判等一系列研究活动。大语言模型在分析理解任务的前提下，反复从专业小模型库（如计量经济学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博弈论模型与机器学习模型等）中提取、筛选并组合出最优解决方案。同时，系统可依据效度评估体系对分析结果进行反复的迭代优化，进而提供基于高质量多源异构数据的分析结果。智能研究方法不仅大幅度提升了研究的效率，同时也能在多次知识对话的过程中提升研究的质量和辅助决策能力。

第三，战略决策环节。该环节是混合智能决策方法与理念在实践应用中的高阶集成阶段。基于高质量知识加工产品、智能研究分析结果以及跨学科知识库对话，系统为治理决策提供了可以反复模拟博弈结果的硅基实验场。依托智能体建模、深度神经网络和复杂系统仿真技术，决策者可以在虚拟的真实环境中动态解决信息不对称、囚徒困境、政策衍生影响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该阶段不仅极大拓展了决策支持在时空维度的边界与推演能力，也为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国际战略环境提供了可重复、可验证的实验场与评估工具，显著增强了战略研判过程的科学性、系统韧性与政策适应性。

（二）面向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典型应用场景

以数字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战略和前沿技术实际应用为导向，逐渐推动由大数据分析向深度人机交互转型的解决方案供给，加速推动从“数据中心战”向“决策中心战”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型。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典型应用场景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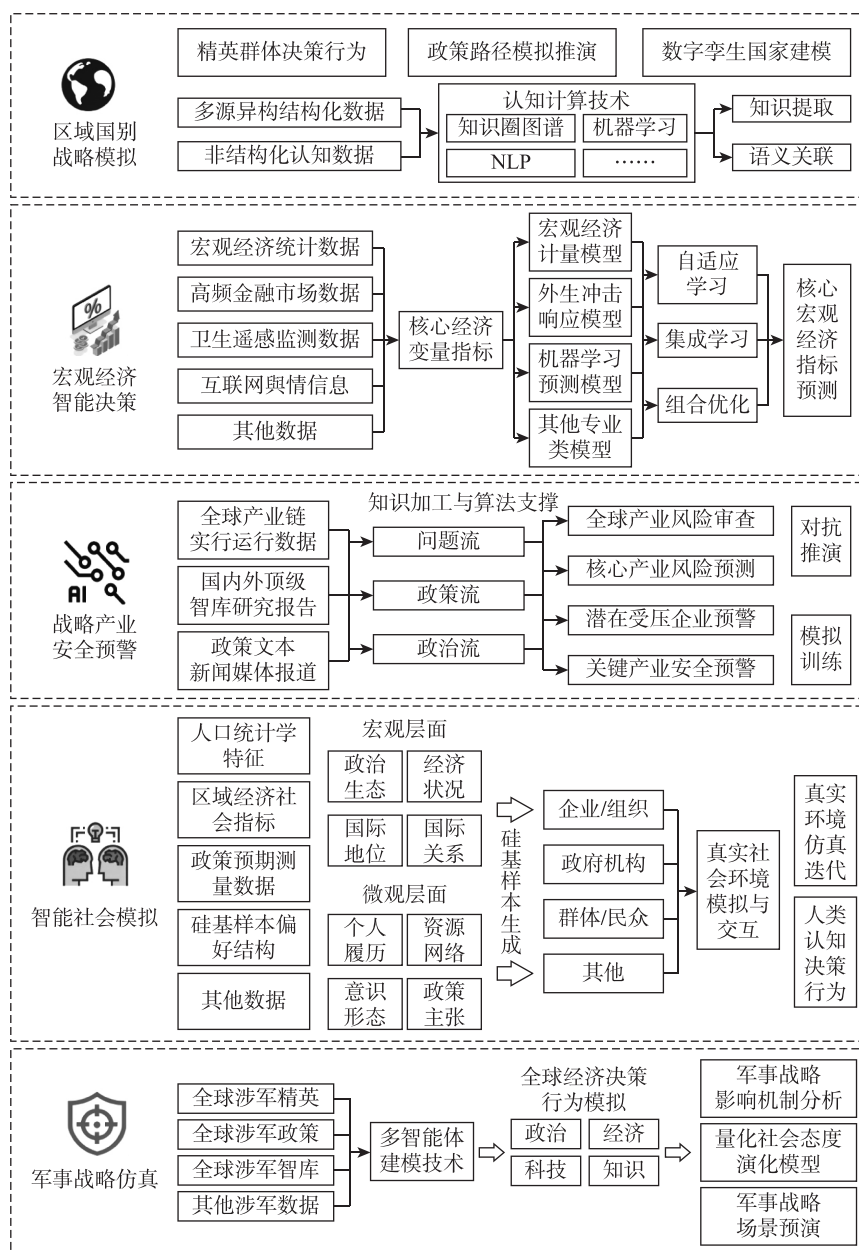


图 2 新型国家治理范式的典型应用场景

一是区域国别战略模拟方法体系构建。该方法依托新型决策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多源异构结构化数据（如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与非结构化认知数据（如智库研究报告、政策声明和新闻舆情信息），并借助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等认知计算技术完成知识提取与语义关联。在此基础上，构建特定制度背景下精英群体决策行为的最佳解释模型，实现对特定国家在关键议题中可能采取的政策路径的模拟与推演。最终，该方法支持完成面向对象国的数字孪生国家建模，形

成一套融合数据驱动与认知推理的混合智能战略分析系统。与此同时，该系统能够精准识别对象国内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行为子群体与核心精英个体，实现对国际关系动向的战略研判、国际关系决策结构性风险的实时监测，以及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关键领域中的风险预警。该系统不仅提供多维度、动态化和可视化的决策支持信息，还可通过政策模拟和情景推演为我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国家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显著提升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战略预判与综合治理能力。

二是宏观经济智能决策方法体系构建。该方法的核心在于依托多智能体建模与仿真技术构建宏观经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在数据层面，该方法通过深度融合多源异构数据，包括宏观经济统计数据、高频金融市场数据、卫星遥感监测数据以及互联网舆情信息等，构建覆盖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超 1000 个核心经济变量指标体系。在模型构建方面，方法整合了包含经典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外生冲击响应模型、机器学习预测模型和其他专业类模型。在规模达万级专业化小模型库的基础上，采用自适应学习与集成学习方法，实现对最优预测模型的自动筛选与智能组合运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核心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研究中，新型决策体系预测精度显著优于传统单一模型驱动的分析框架。未来，该方法体系还可应用于短期政策模拟、中长期发展规划论证以及重大外部冲击下的应急政策制定等多个关键场景，助力宏观经济预测和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基于多智能体驱动的宏观经济态势运行感知流程如图 3 所示。

三是战略产业安全预警方法体系构建。该方法立足于国家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防控的重大需求，深度融合多源异构数据（包括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时运行数据、国内外顶级智库研究报告、政策文本及新闻媒体报道等），通过人机协同机制进行知识提取与语义集成，构建起以“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为核心的多维风险信号体系，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动态图谱分析等技术，将非结构化信息转化为结构化风险变量，依托集成学习与联邦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对预警模型的持续迭代与自动优化。基于该方法构建的多智能体系统能够基于历史制裁案例与贸易限制情景进行对抗推演和模拟训练，从而显著提升对潜在风险的识别灵敏度与预测准确性，为国家相关部门及时制定反制策略、实现精准政策干预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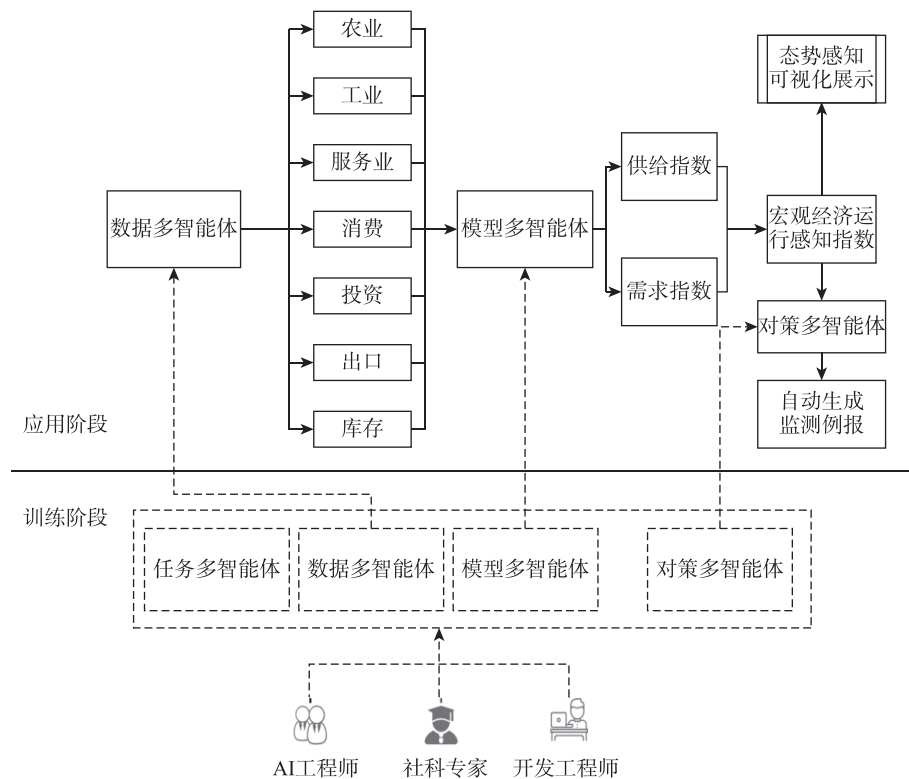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多智能体驱动的宏观经济态势运行感知流程

得关键窗口期，能有效增强我国产业体系的风险抵御与应急响应能力。

四是智能社会模拟领域范式革新。基于“混合智能决策技术”的社会模拟方法是当前智能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其核心在于构建能够模拟人类认知与决策行为的隐式计算模型，并借助社会情境框架工具生成具有代表性的硅基样本。该建模方法高度依赖多模态数据的深度融合与处理，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区域经济社会指标、政策预期测量数据以及硅基样本偏好结构等多维信息输入。通过系统整合宏观层面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国际地位、对华关系等国家特征，与微观层面精英群体的个人简历、资源网络、意识形态及政策主张等信息，该模型能够构建出高度逼真且具有推断能力的人工智能行为体。基于“混合智能决策技术”的新型决策研究方法可以构建“AI 民众”代理，它们不仅嵌入了真实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还具备基于混合模型的推理与交互功能。该系统可动态调用实时政策文本、媒体报道、历史事件等现实资料，构建不断演化的决策环境，并驱使 AI 代理在指定社会情境下按实验设定进行认知与行为输出（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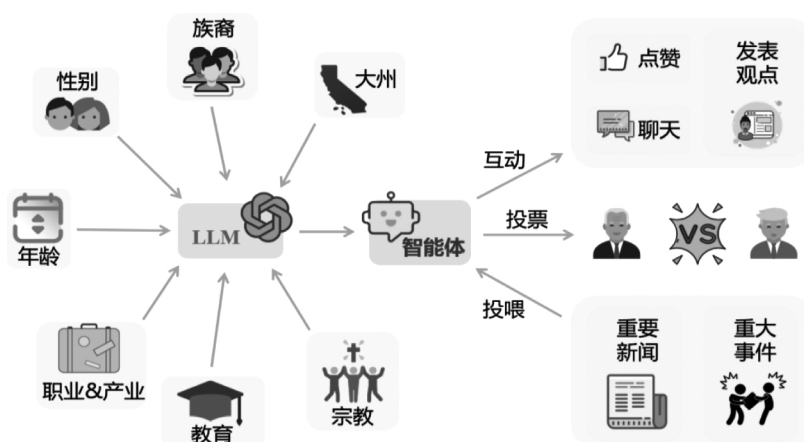


图 4 基于智能体模拟的 AI 代理系统

五是军事战略仿真与军事社会学大模型探索研究。军事社会学大模型是在应对“决策中心战”的战略背景下提出的重要科研工程。在数字时代，大国之间的主要竞争模式已从信息域向决策域转移，即从掌握更多的信息，转向实施更全面、精准、敏捷的决策。尤其在对华的战略竞争中，多国提出“决策中心战”概念，强调寻求依托动态、协调且高度数智化的决策系统，在情报工作等领域制造“强加的复杂性”，并不断引发对手决策失误以消耗其实力。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世界其他国家已率先探索大模型智能体在情报分析、作战规划等领域的军事应用。在此背景下，军事社会计算模拟大模型旨在建立一套能够精准模拟涉军精英群体行为、预测军事战略走向并量化社会偏好的智能化分析系统。该模型构建目标聚焦三个维度：首先，基于多智能体建模技术实现对政治、经济、科技和知识四类涉军精英决策行为的模拟，揭示其互动网络对军事战略的影响机制；其次，整合社会偏好理论与军事历史数据，建立可量化分析的社会态度演化模型；最后，构建虚拟政策实验环境，为军事战略制定提供可验证的预演场景。

三 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智能社会风险的本体论重构与理论范式创新

一是理论重构的困境。以往风险研究虽揭示了现代性与风险的关联，却未能解释智能技术从“工具性存在”向“社会建构主体”的转型。现有理论仍将技术视为风险载体，忽视其作为行动者深度参与风险生成的能动性，导致对数据—

算法耦合风险、技术自主性失控等新型风险解释乏力。若不能突破工业时代的认知框架，便无法理解智能社会中技术与人互构的风险本质，更难以应对算法黑箱引发的“不可解释性治理危机”。可见，目前我们亟待从关系本体论出发重构风险生成逻辑，构建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二是超越工业时代认知框架的理论范式革新。面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等工业时代框架在解释智能技术从“被动载体”向“能动建构者”转型时的核心局限，应着力突破“技术中性论”的认知枷锁。重点探究如何构建“技术—社会”互构共生的关系性风险本体，阐明智能技术作为“准行动者”的能动性在风险生成中的核心作用；如何发展适应技术自主性与系统复杂性的新型认识论框架，以应对“不可解释性”带来的认知挑战；如何创新跨学科研究方法，有效捕捉和解析数据流、算法决策与社会结构动态交织的风险涌现过程，进而为构建具有时代解释力的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研究范式提供系统化的理论工具支撑。

（二）数据、算法与技术交融带来的具身性主体困境

一是认知范式的颠覆与主体感知能力代际断层。“缺陷数据内化—算法逻辑固化—同质数据再生”的闭环机制经常被提及，但当前研究多忽略了数据、算法与技术通过劳动生产融入行动者生活的逻辑链条，这极有可能导致无法解释微观认知扭曲如何引发宏观制度危机。其中，两大核心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是技术具身化导致人类认知机制与技术逻辑深度纠缠，使个体丧失自主风险判断能力；其二是信息巨量衍生的背景下，社会行动者认知与感知社会的传统方法日渐失效。若不重建智能时代信息感知与评估规则，将导致“全民性认知脆弱”——公众既无法识别算法操纵的风险信号，又难以应对技术迭代的速度压迫。

二是亟待建立基于新技术的认知—情感系统。实际上，智能技术的深度具身化正系统性瓦解人类传统的认知—情感机制：算法中介扭曲风险感知、情感计算剥夺情绪自主性，最终导致以职业竞争失败、生活适应困境、技术能力剥夺和情感社交风险为表征的“行动者风险”。其特殊性在于三重演化路径：生成端（算法推荐与注意力经济触发个体认知偏差）、扩散端（群体间情感削弱加速风险复制）、转化端（微观行为异化经复杂适应系统涌现为制度危机）。对此，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通过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揭示智能技术对人文根基的侵蚀效应，

探索建立基于新技术的认知—情感系统的有效路径。

(三) 技术进步、劳动就业转型与社会结构重构

一是新技术驱动的劳动者差异与社会阶层再生产风险。智能技术极有可能通过“技术—行动者—制度”三重互构机制，意外地催化或固化当代社会中的群体区隔，甚至有可能逐渐消解以技术为生的社会阶层。随着智能化与自动化系统的大规模部署，传统行业劳动者更有可能感受到技术革新带来的阵痛。具体表现为，他们更易暴露在由缺乏获取和运用新技术能力引发的风险之下，进而被排除在智能技术的红利之外。此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与政策调控也需培养起应对技术快速迭代的敏捷回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构建起抵御技术性失业与区域经济衰退风险的屏障，进而防范结构性风险沉淀与社会撕裂态势累积。

二是结构性风险的制度固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挑战。既有治理框架存在双重脱节：其一，沿用工业时代的“减少决策风险”逻辑应对智能社会“生成型治理风险”，未触及算法权力重构的社会分层本质；其二，将技术治理简化为伦理规范制定，未能有效应对技术对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对此，应着力构建适合中国的“技术—行动者—制度”互构分析框架，揭示三者互构、彼此交织和相互强化的动态过程，亟须跨领域、多层次的治理创新与制度回应，并最终突破结构性风险固化的治理困境。

(四) 现代战争与智能社会耦合风险的挑战

一是战时智能风险的跨界耦合。智能技术如何制造战时社会风险源？战争如何通过技术权力重构国家安全风险图谱？智能化战争如何挑战了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早就从传统安全治理的物理域，转向智能技术在战时催生的“认知域—社会域—军事域”三维叠加域。具体而言，即生成式AI制造认知战与算法偏见强化战时资源分配不公、自主武器系统引发伦理失控，亟须化解战时风险“跨域渗透—共振放大”的链式危机。对此，未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开发“地缘政治—军事行为—社会心理”动态博弈模型及战场决策递归传导模型等工具，用以模拟战时风险的跨界耦合机制。此外，还需设计“算法伦理审查框架”等治理架构，阻断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劫持，并将自主武器纳入人

类监督闭环，最终重构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体系。

二是构建智能时代国家安全治理新范式充满挑战。从战争与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出发，智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国家安全风险研究具有三重理论必要性。首先，现代战争形态的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构国家暴力垄断权的实施范式。算法赋能的自动化武器系统使传统军事伦理中的“责任链”出现断裂，这种技术异化催生了“谁”在真正掌握算法控制权的巨大疑问。其次，战争对社会结构的重塑效应在智能时代呈现加速特征。大数据催生的“数字孪生战场”不仅改变了作战方式，更通过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的方式溢出了原本“民用—军用”泾渭分明的边界，不仅引发了具有明确区域国别战略属性的渗透性技术风险，还催生了以认知域作战为导向的人机协同个体认知混淆与群体情绪极化风险。最后，智能军事技术发展极有可能引发韧性治理悖论。国家为提升治理速度而建设的智能决策系统，如若战时被他国算法入侵极有可能反向侵蚀政治决策议程。与此同时，“战前—战中—战后”的认知域作战极有可能使传统社会治理快速失效，从而带来社会结构断裂的风险。

四 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展望

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是单一学科的研究热点，更是跨学科、多主体理应长期聚焦的未来之学。智能时代来临之际，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全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那么，如何探索数据、算法、模型、社会、国家与伦理之间的有效契合机制势必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重点任务。为了构建更加适应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框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必然要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回应能力与适应性调适机制。最终，成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体现为制度与技术的先进性，更在于在国家权力、市场活力与社会自治之间构建一种动态、可持续的平衡关系。其核心评判标准应落脚于能够促进社会包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获得国家治理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实现持久的社会团结与稳定，从而持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作者侯博文，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智能社会科学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张润泽，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社会科学实验室副主任，法雨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张书琬）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理论内涵、理性突围 与实践路径

梁昊光 李 扬

摘 要：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与核心引擎，二者构成“目标—路径”统一的有机整体。基于人本导向、创新驱动、绿色底色、城乡共繁荣构成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本文剖析了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难持续的现实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应当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双轮驱动，通过空间优化、产业转型、数字赋能、文化赓续与协同治理等多维路径，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深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化解当前主要矛盾提供了关键抓手，也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人民城市

引 言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①

^① 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城市发展问题是贯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问题,是关乎发展全局的“国之大者”。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正处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多元目标的历史拐点。^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显现出不充分、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包括土地非农化趋势加剧、交通拥堵状况恶化、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环境污染问题凸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深化等。此时,依赖建成区扩张与人口规模增长的传统外延式城市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城市高质量发展从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刚需,不仅是应对城市发展新常态的最优解,也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纲领。^②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载体与创新引擎,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③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两个转向、五个更加注重”的战略坐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④无论从理论内涵、价值取向还是从政策目标来看,城市高质量发展都与中国式现代化密切相关。一方面,城市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指向了城市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与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城市高质量发展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鉴于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域,重新全面、深入、精确地认识与理解城市高质量发展,既是科学把握中国城市发展新常态的关键钥匙与逻辑主线,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与战略路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亟须深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首先,在理

① 方创林:《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

③ 余杰、钱振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五大维度和三重尺度下的实践向度》,《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3期。

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8/content_703814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1月1日。

论层面，必须系统阐释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本质特征和演进规律；其次，在实践层面，应当深入探索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路径，构建包括人本导向、创新驱动、绿色底色、城乡共繁荣的系统性支撑框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先导。

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

城市高质量发展旨在通过精准把握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功能属性与精细化、数智化、绿色化等发展趋势，以系统思维和改革创新为引领，科学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战略、空间格局与治理模式，塑造以人为本、富有活力、特色鲜明、安全韧性和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以引领城市进入高质量样态、动态均衡的发展阶段。^① 具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包容性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取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重构城市系统，^② 是一场深刻的城市价值观革命，即从“物本导向”彻底转向“人本导向”。“人本导向”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归宿，直接对应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的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而非排他性，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而非单纯的经济指标的增长。

第二，更加集约、高效、绿色的发展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基准。这一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城市文明形态的系统性变革，亦是对

① 张文忠、许婧雪、马仁锋、马诗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发展导向——基于居民调查视角》，《城市规划》2019年第11期。

② 陈明星等编著《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25，第72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要求的直接回应与实践落地。其核心在于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内化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严格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积极推进城市蓝网与绿道系统建设,有序扩展生态空间容量,系统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事件的韧性能力。

第三,创新驱动与特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一机制旨在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有效应对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进而以此呼应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本质要求。其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与传统要素投入的路径依赖,将城市发展动力系统性地重构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以及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的协同框架之中,从而培育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城市差异化发展能力与内生增长活力。

第四,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保障。该模式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组织支撑,直接影响城市的秩序构建、活力激发与安全稳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系统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①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治理效能,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治理路径不仅强化了党的执政根基,也有助于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形成协同治理合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挑战。

第五,在系统论指导下的整体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法。该方法立足于城市作为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要求从根本上超越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转向强调整体性、关联性与动态平衡的系统思维。它将城市视作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自组织能力的生命有机体,注重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经济与社会协同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统一。这一方法不仅回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治理创新的内在要求,也为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

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在顺应城市发展新常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双重背景下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与战略命题。其在理论内涵上呈现多维度的鲜明特征，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与系统性。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发展驱动性。城市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在推动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发挥核心动力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亟须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以往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以存量更新与功能提升为主的集约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旨在构建高能级的经济与创新空间载体，形成高韧性的安全屏障，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进而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而坚实的动力支撑。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动态适配性。城市本身作为一个复杂且持续演化的系统，其高质量发展并非一种静态蓝图或固定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响应中国式现代化多方面需求，主动因应经济社会结构变迁、技术革新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进行自我调适与迭代升级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适配性体现为城市能够基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环境等多维因素的演变，及时对发展政策与治理措施进行灵活调整。该能力不仅赋予城市系统以高度的应变力和创新性，也确保其作为现代化关键载体始终有效发挥功能，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坚实且具有韧性的空间支撑。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包容协同性。城市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孤立或排他的进程，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深刻体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包容与协同属性。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空间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系统性重构之中：在城乡维度上，通过推动要素双向流动，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起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城际维度上，依托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战略，推动城市之间由同质竞争转向功能互补与创新协作，共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协同网络，形成“核心—节点—网络”有机联动的城市体系；在功能维度上，强调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智慧与文明六大方面的统

筹协调，系统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从而切实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协同并进。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规划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特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系统性要求。国家通过顶层战略明确宏观发展方向并依托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战略目标与管控要求逐级分解传导，最终在空间布局上予以精准落地，由此构建起一个具有刚性约束力的层级传导机制。同时，依托“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动态监测评估制度，构建起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城市发展定期诊断与反馈调节机制，确保实践过程与规划目标保持一致。政策工具与目标实现程度之间的协同性进一步强化了执行激励效能。这种自上而下的目标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实施反馈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从孤立竞争向区域协同演进、从粗放增长向绿色低碳转型，有效规避了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无序性问题，体现了国家战略理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引领与系统塑造作用。

二 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突围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经过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已经由“增量扩张”转入“存量提质”阶段，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当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突出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难持续等多重挑战，制约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全面实现。

（一）城市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第一，区域间格局失衡，呈现城市群高水平集聚与收缩城市低水平均衡的“两极困境”。一方面，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持续向东部沿海城市过

^① 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1 版。

度集中。据统计，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①以不足全国7%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30.8%的人口，贡献了43.7%的国内生产总值，^②形成了强大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中西部、东北地区部分中小城市及资源型城市面临收缩问题，表现为持续人口净流出、产业空心化加剧与地方财政能力弱化，陷入一种缺乏发展动能与韧性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甚至出现路径依赖下的负向循环。

第二，城市内空间失衡，表现为人口过度集中与城市功能疏解失配的“错位困境”。早期以单中心蔓延、“摊大饼”式外延扩张及“产城分离”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通勤距离大幅延长，进而引发交通拥堵、通勤时间成本上升以及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更为突出的是，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如三甲医院、重点中小学和高品质文化设施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而不少新城与新区则因产业支撑不足与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功能单一化明显，逐步演变为以居住为主的“睡城”。与此同时，中心城区则承受人口与功能过度集聚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面临空间拥挤与历史文脉片段化等挑战，进一步凸显出城市内部空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

（二）城市发展不充分的挑战

第一，城市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面临同质化竞争。在政策考核体系趋同、区域资源禀赋相近且整体创新能力仍显不足的多重约束下，部分城市出现明显的产业同质化倾向，竞相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热门赛道确立为主导产业，并倾向于采用相似的政策工具机械复制先发地区发展模式。^③由于缺乏基于本地产业基础与文化基因的差异化定位，城市间的比较优势被系统性忽视，稀缺要素过度集中，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现象频发。这不仅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低效竞争风险，也阻滞了产业链结构的梯度演进与协同升级，最终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路径依赖式掣肘。

① 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数据计算所得。

③ 《报告：36个重点城市贡献39.2%的国内生产总值》，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508/t20250818_1399871_ext.html?push_animated=1&webview_progress_bar=1&show_loading=0&theme=light，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1月1日。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市民生活质量提升都面临滞后。在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民市民化并非简单的户籍变更,而是一个涵盖身份转换、权利实现与心理认同的三维过程。^①一方面,尽管前期快速城镇化在较短时间实现了大量农民在空间上向城市的转移,但其文化适应与社会网络重构具有时滞,具体表现为该群体在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享有、住房保障等方面仍面临突出困境,同时伴随社会融入困难与文化资本壁垒,导致其处于双重边缘化状态。另一方面,尽管城市经济指标持续提升、物质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但是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可实际获得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并未同步提高。高房价与高物价的双重压力显著挤压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升级与生活质量提升。同时,城市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机遇与个体能力及资源之间存在错配,进一步加剧了市民化进程的内部分化与社会结构的张力。

(三) 城市发展难持续的挑战

第一,资源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已由隐性瓶颈转变为显性阈值,很容易导致城市发展陷入生态超载。城市经济所依赖的线性增长模式与生态系统固有的循环承载能力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快速且规模庞大的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远超其再生与恢复周期,具体表现为建成区土地不断扩张、水资源过度开采与超负荷利用,以及高碳能源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等一系列逼近生态红线的现象;同时,城市污染排放强度持续超过环境自净容量,PM_{2.5}、污水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引发空气质量下降、水体环境恶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与调节能力持续衰减。

第二,传统与新兴安全风险叠加,城市治理体系、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不完善,导致城市发展陷入“韧性赤字困境”。这一困境集中体现于城市系统在抵御灾害、适应变化及恢复功能方面的综合能力薄弱。一方面,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加剧了城市的物理暴露性和脆弱性,对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另一方面,基础设施老化且更新缓慢,尤其是能源、供水、排水及交通等关键系统投入不足,在风险冲击下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面临更高的连锁故障风险。同时,治

^① Kam Wing Chan and Will Buckingham,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 195, pp. 582–606.

理体系仍呈现碎片化特征，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与恢复重建各环节存在制度缝隙；社会层面则表现为风险意识不足、社区自组织抗风险能力较弱与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进一步制约了整体韧性的提升。多重脆弱性叠加之下，城市系统不仅难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与突发公共危机，更在持续演变的风险格局中显得响应滞后、适应乏力，深刻制约其可持续与安全发展进程。

三 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创新

面向未来，亟待顺应城市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坚持从以系统观念谋划改革思路、以改革创新明晰实践路径两个维度共同发力，加快塑造人本导向、创新驱动、绿色底色、城乡共繁荣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持久动能。

（一）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思路

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刻辨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并明确具体目标，坚持以整体、系统和关联的观念谋划改革思路。

第一，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定地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根本理念。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城市发展理念与逻辑必须实现从“物本导向”到“人本导向”的深刻转变，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切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唯有如此，才能使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从而真正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突出规划引领的先行军作用。中国城市发展历来注重规划，各级城市已普遍具备多种类型的规划基础。然

^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第1版。

而,面对复杂城市系统所蕴含的多重不确定性,传统的规划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需求。当前,以“三区三线”^①作为刚性约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成了法定化重构,实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多元规划的有机融合,即“多规合一”。该体系不仅强化了顶层设计的战略性与权威性,也通过广泛公众参与和科学决策机制——“问计于民”,增强了规划编制的可操作性与社会接受度。最终,借助“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能够有效保障“一张蓝图绘到底”,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空间保障。

第三,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协同合力与系统集成。应当认识到,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涵盖广泛、长期推进且极具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靠单一主体完成,也无法单纯通过政策强制或国家财政投入实现。相反,必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与个人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应充分发挥党在总体设计与战略引领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政府作为执行与责任主体的职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化社会组织的桥梁与协调功能,并积极激励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创造性与责任感。通过系统整合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与功能特长,形成制度化和可持续的合力机制,共同应对城市发展中的复杂挑战,扎实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治理基础。

(二) 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面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挑战,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摒弃片面追求城镇化率提升的单一路径依赖,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制度改革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系统谋划并扎实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第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智慧城市。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产业转型升级则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构建创新城市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与精准施策,其重心在于推动城市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

^① “三区三线”分别指的是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创新驱动”。这要求城市决策者具备长远视野、改革魄力和务实精神，坚定不移以数字技术赋能新旧动能转换，推进资源整合、平台构建与环境优化，使城市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和高水平集聚区。

第二，更新发展理念与坚守生态安全底线，构建宜居美丽城市。必须摒弃“城市扩张+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传统线性逻辑，转向以人的全生命周期和日常活动体验为中心，重新审视、规划、建设与治理城市。应将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获得感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根本标准，使一切城市规划与建设行为服务于人、滋养于人、成就于人。同时，须严格遵循“三区三线”所划定的空间管控底线，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刚性约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切实守护城市的蓝天、碧水与净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现代化。

第三，强化城市安全能力建设与延续历史文脉，构建韧性文明城市。在安全层面，应以精细化常态运维、高效能应急转换与自主性灾后修复为核心原则，通过基础设施强化、数字系统智能化升级与体制机制深度变革的系统性重构，实现对城市灾害风险的系统性应对，推动城市抗灾能力实现质的飞跃，最终建立基础设施强韧、管理机制弹性、恢复能力自适应的新型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在文化维度，需立足深远的文化自觉与科学的保护理念，借助创新的利用手法与包容的治理模式，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全面融入城市发展战略、空间规划、产业升级与公共生活之中，使城市成为承载记忆、延续文脉、富有品质与活力的精神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层次文化支撑与身份认同。

结 语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五个转变、五个更加”重要原则。^①相较于2015年提出的“五大统筹”，^②新表述更加凸显中国城市发展理念的持续深化与治理体系的日益完善，标志着中国城市工作全面转向以内涵提升和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把握历史方位，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人民日报》2025年7月17日，第1版。

^② 人民日报社论：《让城市和谐宜居更美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3日，第1版。

质量优先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的关键实践路径和空间载体，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战略指引与根本目标。本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机制展开研究，系统阐释其科学内涵与主要特征，并深入探讨城市高质量发展如何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城乡融合等多重维度，在发展驱动性、动态适配性、包容协同性以及规划与目标导向性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而强劲的发展动能。切实推进这一系统工程，必须以系统思维统领改革设计，以制度与技术创新明确实践路径，准确把握战略重点，积极探索推进机制，从而为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与制度保障。

“十五五”时期，中国城市发展将步入深度转型与新质动能培育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整体引领下，城市发展将越发注重内涵提升、功能协同与韧性建设：一方面，以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全面推动产业体系、空间格局、治理模式的高质量升级；另一方面，以共同富裕、文化自信、人民福祉为价值旨归，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历史文脉传承与社会融合包容。通过更高层次的规划引导、更有效能的资源配置与更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中国城市有望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率先走出一条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宜居、智慧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世界城市文明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范式。

〔作者梁昊光，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扬，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罗婧）

城乡转型的中国特色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邓智平 岳经纶

摘 要：从乡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推进，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工业化带动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保障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成为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鲜明特色。乡村振兴战略重视乡村的主体性，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协同推进有利于补齐“三农”短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有机互动、双向融合，有利于实现“城市性”与“乡村性”的优势集聚。可进可退、协同推进、双向融合三者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城乡转型的新图景，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和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关键词：乡土社会；城乡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理性化的整体过程，是从传统社会结构类型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类型的过程。^② 可见，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包括多个面向。但由于传统社会普遍是传统农业占主导、农民占多数、农村聚落为主的社会形态，这样一个以乡土社会为

① 吴忠民：《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② 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起点的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城乡结构关系转型(以下简称“城乡转型”)无疑是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①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理论^②暗含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从而导致由乡及城的转型,城镇被作为现代的象征,而乡村^③则被视为传统的代表,是现代化进程中被“终结”的对象。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推进和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现代化并不能终结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卡尔·波兰尼明确反对经济学家用“形式经济学”的方法将小农的行为简单化为利益最大化;^④恰亚诺夫认为家庭农场在现代化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利润算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⑤詹姆斯·斯科特发现小农经济行为的主要原则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⑥黄宗智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地区农村“内卷化”经营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⑦小农户以及小农生产方式在当今世界依然广泛存在,实践中南美等地也出现了“再小农化”的现象和趋势,即一些农业企业或农场将其土地再分包给小农户生产经营。^⑧可见,城镇化不可能把所有乡村都变成城市,把所有农民都转变

① 习近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载《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395页。

② 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论述,参见邓智平主编《现代化十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③ 本文是在与城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乡和乡村的概念,包括通常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乡村振兴战略用“乡村”概念替代“农村”概念,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国家现代化全局。参见刘忱《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2期。

④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⑤ Alexander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s”, in Dan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eds.,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Homewood, Ill.: Richard D. Irwin, Inc, 1966, pp. 1-28.

⑥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Subsistence and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⑦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第304~308页。

⑧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修订版),潘璐、叶敬忠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5页。

为市民，特别是对大国^①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拥有14亿多总人口的国情下，即便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有4亿多人口。^②因此，城市和农村长期共存是必然趋势。迄今为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事业。^③

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的最终出路和走向，有学者在上述“终结论”和“延续论”之外，独辟蹊径地提出了“过渡论”。刘守英认为，从结构形态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历经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三个阶段，而城乡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④“城乡中国论”重视城乡之间的互动和融合以及城乡关系变迁的长期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把“城乡中国”作为乡土中国抵达城市中国的过渡阶段，本质上依然是秉持乡—城线性进化的传统现代化观。

综上，一个以乡土社会为起点^⑤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坚持城镇化和乡村发展“两条腿”走路，但城乡分离、各自独立走向现代化容易导致“城市病”与“乡村病”在城镇与乡村两端一同发作。^⑥换言之，完全依赖城镇化把乡村变成城镇或完全依靠乡村自身发展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都是存在缺陷的，

① 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终结论”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也存在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小国和城市国家有可能全部城镇化，但仍可能存在少量都市农业，如新加坡只生产少量蔬菜、禽蛋、花卉等，农产品主要依赖进口；而大国即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再高，也不可能使农业、农村与农民完全消失，如美国这样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多的农业、农村、农民，且同样面临农业效益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问题，但为了粮食安全依然对农业、农民实施大规模补贴。

② 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 王春光：《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④ 刘守英、程国强等：《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科学出版社，2021，第9页。

⑤ 此处“乡土社会”概念借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概念而来。“乡土中国”本质上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其对应的不完全是“城市中国”，而是“现代中国”。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⑥ 叶超、于洁：《迈向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研究的关键与趋势》，《地理科学》2020年第4期。

必须更加注意城镇化与乡村发展两条路径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也是乡土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必经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③如何把握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不仅对于实践中处理好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从农民可进可退的城镇化、协同推进的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双向融合三个维度探讨城乡转型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差异及其独具特色的生成逻辑是什么。

一 农民可进可退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弹性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水平也快速提升。从1978年到202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9.4亿人,城镇化率从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

17.9%提高到 67.0%^①，预计“今后一个时期还会上升”^②。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并不是单向度的进城，而是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也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

（一）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一般模式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③ 任何国家或地区要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必须在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城镇化发展，即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进而实现从乡土社会向现代化都市社会的转型。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同，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实际效果并不一样。发达国家由于可以对外汲取资源和转嫁成本，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较长，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失衡问题相对较轻。后发国家不能对外转嫁工业化成本，面临农业资源和生产力诸要素大规模净流出的窘境，加之部分国家没有实行彻底的“耕者有其田”改革，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导致农村土地集中到少数大庄园主手中，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产生严重的“贫民窟”问题，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就是典型。

由于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匹配的土地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普遍逻辑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带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如 2023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8.30%，两者相

①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ggkf40n/202302/t20230209_190259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1 月 17 日。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载《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 346 页。

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差 17.86 个百分点。^① 这意味着约 2.5 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取得流入地城镇户籍，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村人口。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而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放弃老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② 同时担心自己能否在城镇长期立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居住的趋势，但农民在城乡间依然保有可进可退的空间。

（二）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中国作为一个有 2 亿多农民工^③的大国，不仅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而且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时还能退回到农村，有效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这一独特经验的背后就是农民同时拥有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的自由，^④ 农民进城受阻后有退路。^⑤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的：“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二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三千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

① 何毅亭：《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经济日报》2024 年 12 月 9 日。

②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 年第 2 期。

③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参见《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④ 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理论导报》2009 年第 2 期。

⑤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第 3~22 页。

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①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众多城市人口失业，特别是处在城市边缘的无地农民打工者失业后不能退回乡村就业生活，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城市打工者暴乱。^②

强调进城农民“可进可退”的人口迁移特征并不是提倡农村人口以“农民工”方式进城，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认识到农民在城乡间流动就业的长期性，以极大的历史耐心稳健推进新型城镇化，既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尊重农民意愿，不强制剥夺进城农民的农村土地权益，使农民在有退路、能“保底”的基础上从容追求城市的高收入和优质公共服务，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成为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让进城农民落户和享受均等的市民化服务，更体现在让进城农民可进可退确保可持续的生计，从而实现城镇化的稳妥推进。

在鼓励农民进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国家主要采取了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和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两大措施。

首先，国家积极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推进符合条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但这一改革进程到党的十八大后才明显加快。2014年，国家先后出台三份重要文件，其中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③ 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取消农

① 习近平：《真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载《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464页。

② 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理论导报》2009年第2期。

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①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有序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②2015年,国务院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2016年,国务院又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等。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2021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出台,开启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进程。事实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有序放宽落户条件。2014年以来,共有1.5亿农业转移人口平稳有序进城落户,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35.9%提高到2023年的48.3%。

同时,为了打消农民进城落户的顾虑,国家一再明确要求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条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办发〔2011〕9号)规定:“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的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明确规定:“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④这些政策要求逐步上升到法律层面,

①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1月17日。

②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30/content_9105.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2-02/23/content_1097.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④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7/30/content_894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强调：“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村村民进城落户的条件。”^① 202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提出，“依法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③ 近年来，国家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不断延长土地承包时间，依法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给进城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其次，对于暂时不符合条件或不愿意进城落户的农民，国家积极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④ 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⑤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修订）》，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181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1555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

④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https://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⑤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4-07/30/content_894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① 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要求，“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衡”。^②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③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在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开始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向进城农民延伸，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稳步提高，^⑤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含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超过 95%。^⑥

因此，进城农民在人地分离的情况下，既能落户城镇或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又能保留农村的土地权益，既能获得进城打工的收入，又能获取农地经营的收入，这种可进可退的城镇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当然，从长远来说，未

①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6468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②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01/content_517201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0353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

⑤ 国家统计局：《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推进 城市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http://www.stats.gov.cn/xgk/jd/sjjd2020/202209/t20220929_188880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⑥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5831/twwd/202403/t20240301_111764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来进城农民实现彻底稳定就业和生活后，还需要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宅基地、承包地有偿退出机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此外，从城乡融合的角度看，未来不仅要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而且要推进农村对市民的开放，通过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宅基地制度改革，满足部分已经是城里人的市民下乡需求。^①

总之，户籍制度与土地权益的联动机制，形成了中国城镇化的弹性。而城镇化的弹性空间为城乡协同奠定了基础，而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同步推进，则进一步突破了西方“先城后乡”的路径依赖——这正是中国城乡转型的第二大特色。

二 双轮驱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②“两个客观规律”表明了现代化进程中协同推进城镇化^③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先城后乡”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通过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经验。传统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观点，易使人们片面认为一国的现代化等同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过程，进而把发展的目标简化为唯有工业、城市是先进的，农业和乡村就是落后

① 叶兴庆：《以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2022 年第 2 期。

②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 年第 11 期。

③ 本文采用“城镇化”概念，“城市化”和“城镇化”在描述城乡人口比重变化上并无不同，不细究两者的差异。关于中国为何提“城镇化”以及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联系与区别，可参见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 年第 7 期。

的,发展政策就是要尽一切力量发展工业和城市,同时消灭农业和农村。^①当农业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和农村出现衰败的时候,国家才进行干预,以化解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异步性。^②

显然,尽管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难以通过城镇化的单一路径完成。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灭,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乡村振兴可以吸收借鉴城镇化的一些成果和优势,但乡村振兴要振兴的是乡村,而不是把所有乡村全部变成城镇。^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绝不能放任农业农村自然衰败和凋敝,必须平衡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均衡是大均衡,^④必须在减少农民、农村的同时振兴乡村,走同步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双轮驱动”的现代化之路。这一点对后发国家尤为重要。

西方发达国家启动现代化的起点、条件和环境均与后发国家不同,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信息化是一个依次推进的串联发展过程,而后发国家是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推进现代化,^⑤因而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城乡关系转换路径与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不可能在宽裕的时间、巨大的空间内从容地依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信息化,而是必须在压缩的时空范围内同步推进城乡整体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⑥

(二) 协同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高度重视协同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并在21世纪初

① 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② 胡冰川:《发达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经验与借鉴》,《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③ 陆益龙:《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④ 贺雪峰:《大均衡:进城与返乡的历史判断与制度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1页。

⑤ 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1页。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现代化初期，乡村事实上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① 21 世纪初，我国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到 15% 左右，农业农村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② 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为改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状况，党中央对城乡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以推动工农业协调共进、城乡融合发展。^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积极部署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加快补齐农业农村这个现代化最大的短板和弱项，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④

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协同推进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乡村现代化具有与城市现代化同等的主体地位。“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实现了亿万农民翻身得解放。^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不仅依靠农业、农村、农民的内生积累推动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村教育、卫生、水利等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改革大幕，乡村市场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农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并适时启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开展农村

① 温铁军：《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解读——“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建试验》，《理论前沿》2008 年第 13 期。

② 王玉茹、杨济菡：《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③ 徐勇：《论现代化中后期的乡村振兴》，《社会科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⑤ 习近平：《真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载《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 462 页。

⑥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 年第 7 期。

税费改革并废除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② 为此,组织推进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协同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创新实践。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中国不可能效仿欧洲、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发展几近成熟、跨入发达国家门槛之后才逐渐启动乡村振兴的国家行动,^③ 而是要“同步”推进城镇化与乡村现代化。2000~2021年是中国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支农惠农政策密集出台的时期。早在2000年前后(当时城镇化率约为36.09%)中国就已经敏锐意识到城乡失衡问题,逐步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尝试从制度上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④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⑤ 改变了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五个统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城乡发展”被列在五个统筹之首。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的确立,

①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真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载《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463页。

③ 吕方:《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特征、挑战及关键议题》,《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1998年9月,国家成立了由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江苏全省开展试点,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等20个省(区、市),2003年在全国推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第22页。

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开始发生重要转折。^①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②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经过几年的探索，党和国家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思路更加明晰，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新目标。^③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④

党的十八大后，乡村现代化驶入快车道。2013 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开始实施，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⑤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⑥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重塑城乡关系。^⑦ 2019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

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49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②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05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158717.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5415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第 23 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 32 页。

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 年 10 月 18 日。

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①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② 尽管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开始出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转向，但在城乡关系中“乡”主要是接受“城”辐射带动的一方，出台的政策措施并没有真正反映乡村自身的需要，实际实施效果并不明显。^③ 党的十八大后，同时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和“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提出，转变了“以城统乡”的传统思路，更加重视乡村的主体性，着眼于激发农村内部发展活力、优化农村外部发展环境，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力求探寻一条基于城乡发展地位对等、要素平等交换、资源均衡配置，同步推进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双轮驱动”现代化之路。

三 要素融合：“城市性”与“乡村性”的优势互补

城镇化和乡村现代化是拉动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两驾马车”，但彼此不是像两条平行线独立走向现代化，而是需要双向交流交融，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只有两者功能互补、相互支撑，才能促进城镇化和乡村现代化的健康推进，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换言之，城镇和乡村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地域共生系统，必须在二者良性互动、双向融合的基础上寻找一条协同推进的整体现代化道路。

(一) 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融合

城镇和乡村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功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

-
-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228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 ③ 吴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历程、变迁与反思》，《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6期。

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① 众多学者对城乡不同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城市性”^② 与“乡村性”^③ 的概念和理论。这些对城乡差异的研究加剧了城乡二分法乃至城乡对立。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范围不断向乡村扩张，城乡在空间和经济社会形态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导致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待城乡，认为“城市性”与“乡村性”在实践中构建了“城乡连续体”（urban-rural continuum）。^④ 例如，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功能的扩散会导致城乡界限模糊，全球最终会整合为一个系统。^⑤ 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人虽然身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郊区农村）以及一些人属于城市却不在城市中生活（城郊村的通勤者）。^⑥ 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城镇化并到达城镇化的成熟阶段，人口、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逆城镇化”现象普遍，城市和乡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表现出城乡融合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人口融合、经济融合、空间融合等。^⑦ 城乡之间已经发生的融合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越来越难以界定，由此，城乡融合范式开始取代城乡二分范式。

在城乡融合范式看来，城乡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因此需要加强二者的联系和互动，既将二者的优点集中到一起，又能克服彼此的缺点。如欧文的“和谐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56 页。

②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1938, pp. 1-24.

③ 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④ Paul A. Sorokin and Charles C. Zimmerman, *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9.

⑤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R. Bonnono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⑥ Ronald E. Pahl, “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Sociologia Ruralis*, Vol. 6, No. 3, 1966, pp. 299-327.

⑦ 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3 期。

公社”(或“和谐新村”)就是一个“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特色区域。英国学者霍华德也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并绘制了一个“三磁铁图”,即“城市磁铁”“乡村磁铁”“城市-乡村磁铁”,其中,“城市-乡村磁铁”就是克服了“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的缺点并结合了二者的优点的第三块磁铁,这种新生活方式更加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家园的需要,因此会产生远大于其他两种磁铁的吸引力。^①

“城市性”与“乡村性”双向融合的美好生活^②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但与西方城乡融合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自然演进的过程不同,我国不仅有传统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新时代我国的城乡融合是我们党开拓创新、主动推进制度重构的典型案例。

(二)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的政策实践

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此前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等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而不是城乡各自独立走向现代化)的构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双向融合已成为城乡关系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③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门设有“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一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在都市圈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⑤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①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9页。

② 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年第4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0页。

⑤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09/29/content_543498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明确提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②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专辟“城乡融合”一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单独设置“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部分。^③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和实践来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第二个层次是城市和乡村内部分别加入“乡村性”和“城市性”，集合城乡的优点又避免各自的缺点从而形成“城乡耦合体”（类似霍华德所说的城市-乡村磁铁）。

一是完善“人、地、钱”等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其中，在人才的流动方面，既“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又“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在土地的流动方面，既“总结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又“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在资本的流动方面，“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④而要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就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扫除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新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19年中共中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228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

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央、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并设定了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的发展目标。^①

二是“乡村性”与“城市性”在不同空间的融合和集聚。具体表现为：在“城”中增加“乡”的要素，如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经在城市建设中引入“花园城市”“田园城市”“公园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规划设计管理理念；在“乡”中不断增加“城”的要素，如推动城市的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农村延伸，推动乡村生活都市化，即居住在农村也可以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城市性”与“乡村性”有机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城乡生活质量等值化，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从城乡融合的空间载体来看，都市圈、县城、小城镇、城乡接合部等“中间地带”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和优先方向。这些地方的繁荣发展，既可以缓解大城市过度发展带来的“城市病”，也能推动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村高效扩散，从而赋能乡村振兴。

四 有关讨论

在以乡土社会为起点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推进工业化带动农业人口转移就业，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实现转移就业和城镇化，因此，乡村仍然需要振兴。新时代中国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代表了新时代我们对城镇化和乡村现代化两种路径的探索，而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则代表了我国对这两条路径关系的认识。在实践中，中国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城镇化是可进可退的，进城农民可以非农就业或兼业，遇到失业等困难也可以随时退回乡下老家；乡村现代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并没有等待城镇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228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8日。

化彻底完成之后再对余下未城镇化的乡村进行振兴；城乡融合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缓慢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通过积极推动改革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以制度重构加速城乡融合。城乡转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鲜明特色的背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逻辑和显著优势。

首先，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①也决定了城乡转型的方向和时、度、效。强大的领导力量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根本保障。由于不同国家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展开现代化，“早发国家现代化的起点一般是工业化和国际贸易，而迟发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往往是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因此，现代化的推进力量前者一般是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而后者往往是政党、国家和政府”。^②中国共产党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型政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③而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然受到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我们党也充分认识到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和挑战，所以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权益，从而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既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进城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又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同时，党和政府作为调节城乡关系的主体力量，会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以及城乡关系的演变，适时调整城乡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更好服务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如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农业农村这个现代化最大的短板和弱项，协同推进城乡现代化，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为中国特色的城乡转型提

①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② 张静：《迟发展效果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153页。

供了独特制度优势。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进城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其制度基础就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其成员权利安排。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确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在农业合作化时期,逐步形成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逐步确立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理分开、“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有机结合;近年来,我国又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无论是一元所有、“两权分离”还是“三权分置”,农民只要具备村集体成员资格,就具有相应的土地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不可买卖的,这意味着不会出现土地兼并和无地农民,^①这也是进城农民在城市遇到困难能够回得去农村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这些也决定了城乡转型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在14亿多人口的巨大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因此,中国的城乡转型不仅需要城镇化路径,而且需要乡村振兴路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决定了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道路,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决定了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不能局限于经济和产业振兴,而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在内的全面振兴和全面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依靠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

①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征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地农民,但党和政府通过货币补偿、就业安置、购买社保和返还部分留用地等措施给予了一定安排,从而与土地兼并中出现的无地农民有本质区别。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可进可退城镇化模式的优越性。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2~24页。

累，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又必须通过加快城乡融合，打破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城市的资本、人才等要素下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基本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从而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城乡整体现代化的新路。

总之，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是不断探索城市与乡村共同繁荣、更好满足全体人民需求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城乡转型和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作者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晓航）

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动因分析^{*}

赵西君 刘 雷

摘 要：本文以 2010~2020 年省域数据为基础，从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四大维度，构建含 15 项指标的区域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动因。研究发现，区域现代化呈“东部领跑、中西部追赶、东北转型”的空间格局，且差异随时间演化呈现“经济差距缩小、生态与民生差距动态调整”的特征；七大区域的现代化水平 10 年来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华中、西南、华东增速较快。从区域时空差异的演变动因分析得出，经济现代化源于产业升级与创新集聚，社会现代化受制于教育研发投入和城镇化进程，民生现代化依赖经济基础与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现代化受制于产业能源结构与治理投入等。应依据各地禀赋条件精准施策，缩小时空差异，推进区域现代化高质量均衡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差异；区域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终于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探索出了一条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BJY010）的研究成果和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专家委课题“以信息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5-01-zjw）的阶段性成果。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如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一直是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研究区域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差异并探究导致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探索

各区域单元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实践者，然而各省（区、市）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以及在国家中的功能定位不同，决定了中国区域现代化的不同步性和差异性。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矿产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担负起了助力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任，不仅为全国输送了大量的煤炭、原油、粮食等物质资源，也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大量工业产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基调。先行先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区域探索的重大制度创新，建设试点则成为区域现代化的重要实践^②。1979年后，广东省率先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其中珠江三角洲凭借地缘优势和先行政策迅速崛起，广东省形成了以珠三角为核心区的全省对外开放格局^③。珠三角地区先行先试初见成效后，国家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探索，决定继续发挥广东省的地缘优势，探索现代化建设之路。1992年，广东省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广东省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实践样例和重要经验^④。江苏省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探索中国式现代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1页。

② 王竹君、杜宇玮、蒋伏心：《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的先行逻辑与示范效应》，《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③ 张玉荣：《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与探索》，《小康》2022年第35期。

④ 臧艳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以“追龙”战略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

化道路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创新发展，其中“苏南模式”创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以集体经济推进工业化，进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壮举，2013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支持苏南地区积极开展现代化建设区域实践探索，这也是中央政府以规划方式支持的第一个区域现代化实践探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很多经济发达省份也都提出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如上海市提出努力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北京市提出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目标。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浙江省被定位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争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战略目标。总之，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以来，各省（区、市）都立足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实践路径，如表 1 所示。

表 1 典型省份的区域现代化探索

代表性省份	主要战略和定位	现代化推进的主要政策
广东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意见》
江苏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决定》《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
上海市	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决定》
北京市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共北京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浙江省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协作战略在推进区域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区域协作主要通过建立一定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重点推

动地区间在资本、技术、人才、交通等各方面共享合作，达到资源要素最优配置的目的，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经过多轮一体化推动，三地之间的空间联系、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合作日益紧密，京津冀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2010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2019 年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实施，经过多年努力，2021 年长三角一体化指数水平已达到 2012 年的 1.69 倍，目前长三角正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2016 年，国务院要求广州、深圳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公布实施，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粤港澳大湾区又被确立为我国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它必将担当起“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不仅如此，主体功能区战略、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海南自贸区等重大国家区域战略的实施，无疑将会进一步增强各地间的紧密合作程度，也必然会更有力地支撑起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

二 区域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国外对于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国家的“社会指标运动”。1960 年，国际现代化学者在日本箱根会议上提出了经典现代化的八项衡量标准，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等，这些标准以定性为主，但为后来的现代化标准制定提供了指导依据。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指标成果有，美国学者布莱克从经济社会领域提出了包括人均 GNP、劳动力就业、健康状况、城市化、教育、收入分配等 10 项现代化指标^②，为后来现代化水平的简捷有效测度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英格尔斯以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为基础理论框架，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比例、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等 11 项现代化评价指标，并根据当时完成工业化

① 赵西君：《经济一体化与地区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中国市场》2018 年第 18 期。

② 西里尔·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景跃进、张静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国家的经验提出了每个指标达到现代化国家的参考标准^①，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实际为拉西特指标体系^②）在我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一度成为我国现代化国家水平的评估工具。一些国际组织虽然没有建立专门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但也建立了反映各国社会、经济、生态、产业、人文的指标体系，比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通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国民总收入3个维度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世界银行组织构建了涵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共计20个维度1500项指标的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含17个维度200余项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欧盟等发达国家和部分观察国家构建了包含12个维度100余项指标的国家概览指标体系等。这些国际组织和权威专家提出的指标体系也为我们构建区域现代化评价指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一些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姜玉山和朱孔来提出了包含27项指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指标体系^③，陈佳贵和黄群慧提出了工业现代化标志和衡量指标^④等。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成为新的热点。任保平和张倩从经济、社会进程、城乡区域、生态文明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领域构建了46项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⑤；蒋永穆等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也是我国五大新发展理念的体现^⑥；贾晓芬和张宏莉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现代化五个维度构建了72项评价指标^⑦；崔岚等从收入与劳动产出水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6个方面构建了基本实现社

①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第24~25页。

② 谢立中：《关于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几点讨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③ 姜玉山、朱孔来：《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方法》，《统计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陈佳贵、黄群慧：《工业现代化的标志、衡量指标及中国工业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⑤ 任保平、张倩：《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2022年第6期。

⑥ 蒋永穆、李想、唐永：《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改革》2022年第12期。

⑦ 贾晓芬、张宏莉：《科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国家治理》2022年第20期。

会主义现代化的 20 项指标^①；赵西君等构建了包含经济现代化、社会文明现代化、科技教育现代化、生活质量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 5 大领域 32 项指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②；龙海雯测度了中国绿色现代化水平^③。这些指标体系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特征和现阶段发展理念为逻辑构建设计的，对于我国区域现代化指标体系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区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二者呈现局部与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一属性决定了区域现代化难以完整涵盖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宏观特征——例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因涉及国家层面的整体属性与国际定位，在省级行政单元的评价框架中无法直接用指标体现。与此同时，区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实践载体，其评价维度需重点锚定可落地、可衡量的地方发展目标，尤其要突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作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运行状态，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导向，确保评价体系与地方发展实践紧密衔接。在具体维度设计上，本文借鉴既有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结合区域发展的实际特点，最终确定四大核心评价维度：其一为经济现代化，主要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为区域现代化提供物质根基；其二为社会现代化，主要衡量地方社会文明程度与创新发展能力，体现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进程；其三为民生现代化，将共同富裕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福祉，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四为生态环境现代化，凸显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性，推动区域层面实现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生态资产的价值转化，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在区域现代化评价指标的筛选过程中，需兼顾两重需求：既要涵盖城镇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规律，又要融入知识经济时代下科技创新、数字转型等前沿趋势，确保指标体系既贴合普遍发展逻辑，又彰显时代特征。指标遴选需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科学性与实操性统一，指标设置需符合现代化理论

① 崔岚、李莹莹、赵德友：《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测度模型及实证分析》，《统计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10 期。

② 赵西君、郭剑锋、季小妹、刘澍：《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家》2023 年第 7 期。

③ 龙海雯：《中国绿色现代化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管理现代化》2024 年第 2 期。

基本内涵，同时兼顾数据时效性、统计口径一致性与获取便利性，避免指标设计脱离实际导致评价失真；其二，政策导向与特色融合，指标体系需紧密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方向，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协调均衡”的核心特征，确保评价结果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其三，精简性与有效性平衡，国际主流现代化评价体系多以精简指标实现高效测度，如英格尔斯（拉西特）设 11 项指标、人类发展指数仅含 3 项指标，精简设计可减少指标间的信息重叠与权重抵消，提升评价精准度。基于上述原则，结合国内外指标体系设计经验与中国区域发展特色，同时匹配现有统计制度框架，本文从四大维度构建了包含 15 项指标的区域现代化评价体系：经济现代化维度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社会现代化维度反映社会文明与创新能力，民生现代化维度凸显共同富裕与民生福祉，生态环境现代化维度体现绿色发展与生态保护，形成覆盖经济、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的全方位评价框架（见表 2）。

表 2 中国式现代化区域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经济现代化	1	人均 GDP	元	中国统计年鉴
	2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中国统计年鉴
	3	非农产业占比	%	中国统计年鉴
	4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	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现代化	5	城镇化率	%	中国统计年鉴
	6	人均研发投入经费	元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7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	各省（区、市）“十三五”规划（2015 年）、“十四五”规划（2020 年）等
	8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中国统计年鉴，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民生现代化	9	养老保险参保率	%	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10	人均预期寿命	年	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11	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人	中国统计年鉴
	12	恩格尔系数	%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续表

一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 现代化	13	城市空气质量达二级标准天数比例	%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14	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计算所得
	15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吨	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计算所得

注：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以及各省（区、市）经济社会规划现状数据等。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动态可比性，表中价值型指标均用 GDP 增长指数做了不变价处理。

为系统呈现各省（区、市）现代化进程的动态演变特征，本研究选取 2010~2020 年为观测周期，覆盖十年发展阶段以捕捉长期趋势。在数据处理环节，针对指标量纲差异问题，采用学界常用的极值归一化法进行无量纲转换；同时考虑到部分指标存在最高值，例如城镇化率达到较高水平后，继续提升已无法有效反映现代化核心内涵，若仍按常规归一化处理易导致评价偏差，因此借鉴英格尔斯现代化评价体系中的特定阈值设定思路，对达到上限标准的指标直接赋予 100% 的标准化分值，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在权重确定层面，层次分析法凭借其多层次、多准则评价问题的适配性，能够通过两两比较的逻辑降低主观赋值的随意性，成为本研究权重计算的基础方法。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协调”的核心要求，区域现代化评价需均衡考量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四大维度的贡献——四者分别对应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文明表征、价值目标与生态底线，缺一不可。经多位领域专家论证，最终确定四大维度采用等权重设计，既简化了计算过程，又契合了“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发展逻辑。

三 中国区域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一）区域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

将 31 个省份划分为七大区域，每个区域具体范围如下。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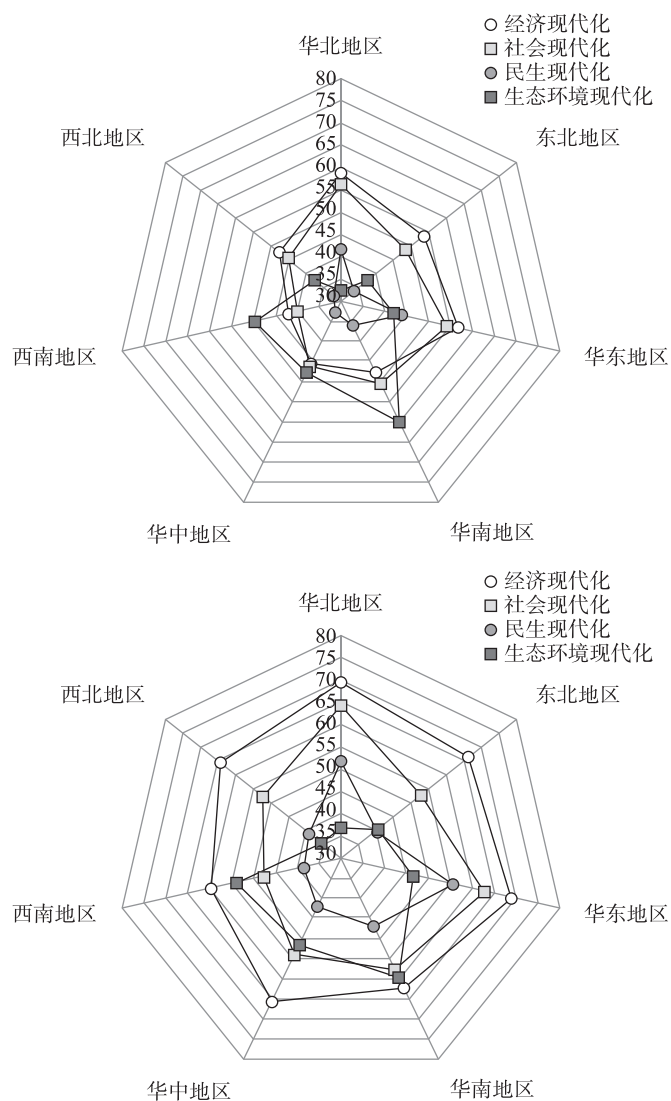
省；华东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华南地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福建省；华中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西南地区：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从七大区域的年均增长率（见表 3）可以看出，七大区域的现代化指数保持增长趋势。从系统要素的角度来看，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现代化指数在 2010~2015 年的年均增长较为突出，2015~2020 年经济现代化指数保持了原有优势，民生现代化指数增长率有所下降，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数增长较快；从地区的角度来看，华中、西南和华东地区的现代化综合水平增速较快，其中，华中和华东地区的优势体现为经济现代化水平高，而西南地区则表现为民生现代化指数增长率较高。现代化指数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地区在不同领域有所差异，如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社会现代化指数增长率较低，华南和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数较低。

表 3 分领域现代化指数年均增长率

地区	单位：%							
	经济现代化指数		社会现代化指数		民生现代化指数		生态环境现代化指数	
	2010~ 2015 年	2015~ 2020 年	2010~ 2015 年	2015~ 2020 年	2010~ 2015 年	2015~ 2020 年	2010~ 2015 年	2015~ 2020 年
华北地区	4.51	4.38	2.64	2.24	3.43	2.06	2.71	3.77
东北地区	3.72	3.01	1.87	1.73	4.36	1.56	1.58	2.69
华东地区	4.84	4.77	2.94	2.76	3.95	1.52	2.14	3.54
华南地区	5.52	3.37	2.60	2.03	5.40	1.69	-0.21	2.49
华中地区	5.06	4.33	3.20	2.97	7.59	1.59	1.62	3.57
西南地区	4.70	4.63	3.53	2.53	7.27	2.64	1.62	2.69
西北地区	4.31	3.65	2.99	2.38	6.36	2.24	-1.14	4.08

雷达图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各大区域的现代化变化规律，并且数据的分布与扩散程度可以体现地区指标的薄弱项。由图 1 可知，全国各省（区、市）经济现代化水平 2010 年时较低，其中东北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水平需要提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东北全面振兴战略的推进，东北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社会现代化水平稳定提高，并且区域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因为其雷达图的大致

形状轮廓并未发生变化，仅有面积的逐时间段扩张；民生现代化随着年份的发展，变化较大，2020 年几乎覆盖整个雷达图，各大区域分布趋于均匀；生态环境现代化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地域性，其中西南、华中和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现代化水平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而西北、华北及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现代化水平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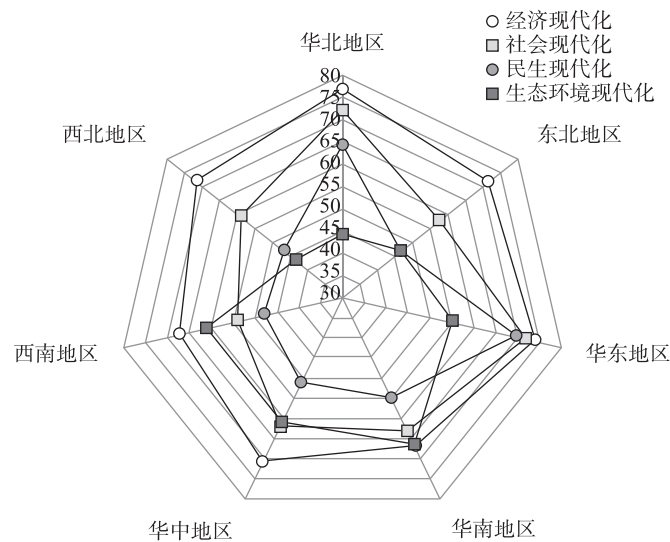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2015 年、2020 年七大区域现代化水平

（二）区域现代化水平的空间演变格局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 31 个省（区、市）的现代化平均水平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现代化低水平（35.25–43.46）、现代化较低水平（43.46–48.88）、现代化中等水平（48.88–56.54）、现代化较高水平（56.54–66.93）和现代化高级水平（66.93–91.24），并基于 ArcGIS 分析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三个时间节点上的现代化水平格局演变特征。2010 年，31 个省（区、市）现代化分布水平呈现明显的胡焕庸线分布。胡焕庸线以南的省份呈现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以北的省份总体低于南部省份，现代化水平有待提升。2015 年，中等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占据主导地位，较低现代化水平的省份分布在我国西北及东北地区，较高现代化水平的省份并不局限于我国的中心城市，一些沿海地区省份的现代化也发展到较高水平。2020 年沿海省市以及中心城市等地的现代化呈现高水平，部分是由较高现代化水平演变而来。

（三）区域现代化评价空间关联特征

1. 全局空间相关特征

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分析 31 个省（区、市）的现代化空间相关水平。由表 4 可以观察到，31 个省（区、市）的现代化分布空间集聚效应明显，相关系数为

正,即数值大于零,呈现空间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现代化的各个维度看,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在2015年、2020年相比2010年的空间显著性有所降低,空间集聚性逐渐减弱;社会现代化和民生现代化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先升后降,二者的空间集聚相关性水平在2020年有所下降。生态环境现代化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性虽然减弱,但是相对其他现代化领域,仍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优势。总体来看,31个省(区、市)的现代化综合水平空间相关性不高,表明我国现代化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

表4 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及显著性检验统计

现代化维度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经济现代化	0.1785***	0.1332**	0.1400**
社会现代化	0.1635***	0.1794***	0.1590***
民生现代化	0.1883***	0.1795***	0.1545***
生态环境现代化	0.5179***	0.3915***	0.2348***

注:***、**分别表示在1%、5%置信水平上显著。

2. 局部空间相关特征

运用ArcGIS中的聚类和异常值分析功能,对31个省(区、市)的现代化水平进行局部空间集聚格局演化分析,可将局部空间聚类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等四种集聚类型。整体来看,大部分省(区、市)现代化水平局部聚类不显著,三个时间段内没有产生剧烈波动。低-低型分布在西北地区,高-高型集聚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域的东南沿海部位。总体来看,31个省(区、市)的现代化水平呈现片状分布特征,最终形成“东南沿海高值连片、西北内陆低值连片、中间过渡区零散分布”的片状格局。

四 中国区域现代化时空差异演变的动因分析

(一) 经济现代化动因分析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支撑。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演变,产业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

新产业、新业态会不断出现，新生的现代化产业部门则会通过挤占、改造、迭代等方式替代原有产业部门，进而推进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变。经济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如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省市产业发展质量明显优于经济现代化程度低的省份。比如，广东省产业结构从改革开放初期以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逐渐升级到以电子信息制造、汽车制造、石化化工、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质量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2010 年广东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7.59 万元/人，2020 年则提高到 15.74 万元/人，提高了 1 倍多。因此，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的时期，一些新兴技术加速涌现，如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呈爆发式增长，各省（区、市）应进一步抓住新技术发展的机遇，加速产业化，实施新型工业化，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组织方式创新。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要素配置，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因素，全方位提高要素生产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①

（二）社会现代化动因分析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在社会领域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呈现，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组成部分。^② 社会现代化以人的素质提升与科技进步为核心，而教育投入决定劳动力质量，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二者共同构成社会现代化的“双引擎”。现代化程度高的省份在教育与研发领域的投入显著领先，比如，2020 年北京市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2.64 年，人均研发经费达 10629 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3.8%，^③ 依托高素质劳动力与高强度研发投入，形成“教育—人才—创新”的良性循环，社会文明程度与公共服务效率全国领先，江苏省、浙江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② 赵西君、靳京、吴殿廷、高岩辉：《基于共性特征的社会现代化国际比较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25 年第 1 期。

③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计算所得。

省等省份同样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较高。城镇化进程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演进的关键外在因素。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空间集聚的过程，更是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而公共服务的覆盖广度与质量，直接决定现代化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首先，各省（区、市）应加快提高人口素质，培养更多新型劳动者，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应注重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研究，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其次，要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要加大城镇化滞后省份的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另外要重点补齐乡村与中小城市的医疗、教育短板，通过“城乡结对帮扶”缩小区域差距，让城镇化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居民，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质变。

（三）民生现代化动因分析

民生现代化的本质是居民生活质量与保障水平的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①，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继续大力提升民生福祉。然而，民生现代化的核心基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将直接决定居民的消费结构层级以及社会保障参与能力。一般情况下，经济实力强的省份，民生现代化指数也会相应较高，比如2020年北京市恩格尔系数仅为21.5%，^②说明居民有更多收入用于除食品之外的其他高层次消费。民生现代化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依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兜底”与“提质”，这些将直接影响居民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比如，2020年北京市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26.2人，养老保险参保率90.39%，人均预期寿命82.43岁，^③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的高覆盖，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其民生现代化水平自然领跑全国；浙江省、福建省等省份通过“数字化公

①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5日，第1版。

②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③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共服务”提升资源可及性,让民生保障更高效、更公平。因此,为加快提升民生现代化水平,首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重心转向民生领域,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尽快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西部地区更应该提高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其次,通过制定实施“国家生活质量议程”“美好生活行动纲要”等国家战略,不断丰富人们的文化旅游体育生活,增加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未来可以通过减税降费等方式激励企业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延长休假时间。最后,持续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设施建设,增加基础医疗设备与专业人员,解决偏远地区“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同时通过数智化手段缩小区域医疗资源差距。

(四) 生态环境现代化动因分析

生态环境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阐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特征之一。生态环境现代化的影响因素很多,它既受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观念意识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能源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能源富集或传统工业依赖型省份生态指标明显滞后,而产业结构高级的省份,如广东省通过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低碳产业发展,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同。另外,生态治理投入强度与政策执行力度,也是推动生态环境现代化演进的关键制度动因。生态环境改善离不开财政投入、技术应用与政策约束的协同,而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与执行效率,直接决定环境治理成效。近年来,我国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明显提升。为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现代化,未来我国各省(区、市)应继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积极推进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要充分运用先进的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总之,2010年以来我国各省份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但省域层面现代化时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2页。

差异明显，呈现“东部领跑、中西部追赶、东北转型”的空间格局，且差异随时间演化呈现“经济差距缩小、生态与民生差距动态调整”的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重大部署，为省域现代化均衡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强调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①立足“十五五”时期发展新形势，破解区域发展痛点难点，核心在于尊重各地发展规律与资源禀赋差异。唯有立足各省域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构建“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推进机制，才能缩小时空差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省域层面实现高质量、均衡化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赵西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雷（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琬）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0/content_704544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2月1日。

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及其反思

鞠 豪

摘 要：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单一和连续的，而是经历了数次现代化道路的更替。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又一次站在了现代化的新起点。基于全球层面、欧洲层面和中东欧地区层面的影响因素，中东欧国家大多选择了相似的现代化路径。转型与一体化成为这些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主题，其现代化进程也更多与欧盟联系在一起。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欧洲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东欧国家也开始对其后冷战时代的现代化路径进行反思。部分国家更将这种反思付诸实践，并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不同幅度的调整。中东欧国家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调整展现了现代化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能够推动现代化理论的创新。但从一个更为宏观和长期的视角来看，这种反思和调整能否上升为区域共识并衍生出新的现代化路径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关键词：现代化；中东欧；转型；一体化

从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现代化代表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① 这一进程以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标志，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的变迁，以及社会心理、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方方面面。如今，在

① Neil J. Smelser, 1992.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n Theories of Social Change," pp. 369-94 in Hans Haferkamp and Neil J. Smelser (ed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心愿。然而，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漫长的探索过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各个民族的生产和交往推进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①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虽然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运动规律，但也深受自身国情和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不同的地理位置、国家体量和历史发展脉络使世界各国发展出了差异化的现代化进程和多元化的现代化模式，其现代化水平和风貌也因此千差万别。

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在迈入现代化之前，它们已经缔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但因为种种原因，现代化所需的制度建设、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分化等因素在中东欧国家并未得到充分酝酿，导致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后发和从属地位。在开启现代化进程和获得民族解放后，中东欧国家也曾尝试过多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民主道路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曾成为它们效法的对象。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现代化探索或是终止，或是宣告失败。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宣告中东欧国家又一次站在了现代化的新起点。在这一时期，转型与一体化成为中东欧国家的共同主题，其现代化进程也更多与欧盟联系在一起。对于过去 30 余年中东欧国家转型和参与一体化合作的成败得失，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成果问世。但无论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阐释，还是对具体领域和制度的微观分析，都很少融入现代化的视角和理论。有鉴于此，本文在充分总结中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分析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及其动因，并阐释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在现代化问题上的反思和调整，进而发掘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特性及其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意义。

一 中东欧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欧国家是最早的探索者。凭借资本原始积累基础上的科技进步，西欧国家率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并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占据中

^① 王兴辉：《马克思视野中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及道路选择——从“欧洲中心论”疑云谈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24 年第 9 期。

心地位。也因为这一点,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许多后发国家效仿和推崇。^①因为与西欧毗邻,中东欧地区较早接受了现代化浪潮的洗礼。但因为先天条件的不成熟,中东欧国家没能复制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现代化道路也经历了数次更替。在冷战结束前,中东欧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初期探索阶段。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东欧各民族都曾缔造了绚烂多彩的文明。在其生活的土地上,也出现过显赫一时的封建国家。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这些封建国家既扮演着贸易与文化交流枢纽的角色,也时常成为战时双方交战的前沿阵地。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们的建立与发展为中东欧地区后续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身份认同和文化标识。但遗憾的是,这些封建国家在中世纪晚期逐渐走向没落,其领土则被外部大国吞并和瓜分。南部的巴尔干地区大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划归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其他各民族也都处于上述三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因此,当现代化浪潮扩展到该地区时,中东欧各民族在缺乏政治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背景下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洗礼。也因此,各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与其所属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德意志与奥匈帝国治下的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状况也最为良好。沙俄控制的地区次之。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则较为落后。

初期的现代化探索给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经济上,工业革命与科技进步的成果由西欧迅速传播到中东欧,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的工农业发展。但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争夺中,中东欧地区的利益常常要屈从于所属大国的整体利益。双方在关税与贸易政策等方面的矛盾也越发尖锐。在政治上,现代化带来的先进政治理念唤醒了中东欧各民族的自主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实现民族解放,走上独立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成为中东欧各民族共同愿望。1848年欧洲地区的反封建专制革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爆发。虽然民族主义没

^① 鞠豪:《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特性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4期。

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中东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波兰、黑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阿尔巴尼亚等地纷纷爆发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及斗争。与此相适应，所谓“文化民族主义”的潜流也逐渐变成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① 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谋求打造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成为这一时期中东欧现代化进程的主线。

第二，独立发展阶段。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中东欧各民族陆续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分别于 1877 年、1878 年、1912 年宣布独立，黑山则是在 1878 年柏林会议上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传统大国纷纷解体。其治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重新获得了独立地位。包括黑山在内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则成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对于重获新生的中东欧国家来说，它们当时普遍面临两大重要任务：一是恢复和发展战时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二是在维护和巩固国家独立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除匈牙利曾进行了短暂的社会主义探索外，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遵循了西欧国家的发展道路。政治上，强化国家机器，重塑民族国家，通过权力分配、资源协调甚至军事移民的手段解决内部统一问题。经济上，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和国家工业化，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使社会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外交上，重新调整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大国的关系，维持中东欧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现状。在战后的经济复苏方面，多数中东欧国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表现较好，成为当时排名世界前十的工业强国。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则依然偏低。波兰的农业人口 1921 年时占全国人口的 63.8%，1938 年才降至 20%。南斯拉夫 1923~1939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仅有 1.9%。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家经济命脉操控在意大利手中。^② 建立在奥匈帝国废墟之上的匈牙利则因为《特里亚条约》损失了大量的领土和资源，导

① 方雷、赵建波、鞠豪：《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多重性》，《国外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

② 孔凡君：《中东欧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 年第 2 期。

致其战后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都大为削弱。对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复杂的地区局势和国际环境不允许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上,而民族主义演化出的泛民族主义^①和大民族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现代化路径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中东欧国家放弃了原本的政治设计,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部分国家甚至在内政和外交理念上向法西斯主义靠拢。法西斯政党和类法西斯政党也在这一地区更加盛行。

第三,以苏联为师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在抗击法西斯侵略和争取国家解放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而在另一部分国家,苏联在其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苏联的治理模式和现代化理念也由此扩展到这些国家,并对其民众有了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虽然各国的情形略有不同,它们在经过短暂的人民民主主义探索后都步入了苏联模式。

从现代化的路径看,中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具有如下共同特征。政治上,它们都确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其他政党则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政治监督和民主协商等作用。经济上,步入苏联道路的中东欧国家都建立了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首先,将左右国家经济命脉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银行收归国有,以确立国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强调计划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将整个经济体系转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②再次,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快速改变整个国家特别是乡村地区的落后面貌。在这一过程中,以能源和军工为代表的重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则成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最后,快速的工业化催生了一大批规模巨大但产业相对单一的工业城镇。这些工业城镇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外交上,中东欧国家也与苏联高度捆绑。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框架内,双方建立了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联系,并在与苏联和西方对抗的过程中保持紧密合作。在苏联模式下,中东欧国

① 泛民族主义是在民族主义出现后,同一族源、具有亲缘关系的不同民族要求紧密联合、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潮,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② 孔凡君:《中东欧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2期。

家变得更加趋同。但国情及与苏联关系模式的差异仍导致各国的现代化水平呈现多样性。例如,在东欧剧变前夕,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坚持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经济效益不高,政治上坚持高压统治,人民的不满日益加深;波兰和匈牙利引进部分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人民生活水平在一段时期内有显著提高,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始终是改革未能解决的难题,改革陷入了死胡同,经济开始出现危机。^①从二战结束到东欧剧变的40多年里,许多中东欧国家都曾试图对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体系进行调整或改革。这些调整或改革虽然有着不同的结果,但都使中东欧国家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保留了一些自身传统的宽松特征。

二 后冷战时代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及动因

苏东剧变与冷战结束标志着中东欧国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体制重建与发展道路的选择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各种现代化理论和设想也在這裡有了实验的机会。^②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逐,曾先后主导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与发展进程。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将中东欧国家视为研究的热点,从民主与市场等不同角度探讨中东欧国家向其他体制过渡的策略与条件,并将其潜在的转型与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从中寻找出最优的发展路径。^③然而,经过反复的讨论和博弈,中东欧国家大多选择相似的发展方向。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来自剧变前基本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历史经验,也基于当时特殊时空背景下的若干因素。这些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因素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一体化进程在欧洲的快速发展,以及安全环境在中东欧的迅速变化等。

第一,全球层面。德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曾经把19世纪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而把20世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他认为,20世纪有两大重要政策,一个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另一个就是贝弗里奇的福利

① 王义祥:《东欧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6期。

② 孙敬亭:《转轨与入盟——中东欧政党政治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第1页。

③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国家政策,这两者构成了整个20世纪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①。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史走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蓝领工人数量减少,传统工人队伍萎缩。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福利国家趋于破产,凯恩斯主义政策日渐式微,新自由主义则开始由理论、学术向范式化、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发展,并确立了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取向中的主流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新自由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形式,并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实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盛行也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以苏联为师的现代化模式之所以难以为继,正是因为其经济发展陷入严重的困难。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关注经济发展。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转型注重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试图采用保障经济自由,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法,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解决经济领域内存在的问题,进而以经济沟通政治,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②。这一理念与中东欧国家当时的发展诉求相符。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暗含着对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开放市场的要求,这使其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天然联系在一起。对于志在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中东欧国家来说,以新自由主义指导其政治经济转型也有助于其达成这一目标。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开启了新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欧洲层面。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最初的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共同体,再到现在的欧洲联盟,欧洲一体化逐步消除内部壁垒并建立共同的治理体系,并推动成员国从经济到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基于成员国的共同意愿构建深度的一体化合作,进而反哺成员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式不仅为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所效仿,也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① 刘玉安、武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社会自由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3期。

②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第5~19页。

这一进程之中。到欧盟 1993 年正式成立时，欧洲一体化已经经历了三次扩员，其正式成员国由最初的 6 个扩展到 12 个，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三国的入盟也基本确定。^① 中东欧国家与西欧毗邻，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已经加入欧盟的情况下，与其有着密切历史联系和文化羁绊的中东欧国家自然成为欧盟扩员的潜在对象。而中东欧国家也有志于通过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获得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针对中东欧国家的入盟诉求，欧盟设立了明确的标准：第一，必须拥有捍卫民主稳定的机构与法治，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第二，必须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第三，必须拥有履行成员国职责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宗旨。^② 为此，中东欧国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并在治理模式上向欧盟趋同。而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制度、政策与政治文化对它们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明显的欧洲化现象，其现代化进程也更多与欧盟联系在一起。

第三，中东欧层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华约解散与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环境。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逐渐接受其在中东欧影响力减弱的事实，转而将独联体国家一体化和构建新型欧亚战略作为自身外交战略的重点，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向东方转移。^③ 美国对中东欧地区事务的兴趣也因冷战结束而减弱。除了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时，美国更多时间都“隐于幕后”。美俄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中东欧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权力真空”。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例如边界纠纷、文化与宗教冲突和跨界民族问题都在短期内迅速爆发，由此产生的南斯拉夫战争和其他小规模冲突不仅严重阻

① 鞠豪：《“多速欧洲”与中东欧国家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第 54 页。

② “Conditions for membership |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Enlargement Negotiations,” accessed August 20, 2025,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policy/conditions-membership_en.

③ 鞠豪：《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俄罗斯学刊》2021 年第 5 期。

碍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与发展,也对整个欧洲的和平安全造成了冲击。^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中东欧国家一方面将加入北约作为其主要的安全战略选择,以获取稳定可靠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积极向欧盟靠拢,并要求欧盟以东扩的方式增强自身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进而将中东欧国家纳入稳定的安全秩序内。安全领域的重大需求也传递到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路线选择上。一种更加贴近西欧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现代化模式被视为与北约和欧盟紧密绑定的重要手段,也由此逐渐主导了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基于以上因素,中东欧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政治上,仿照西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建立全新的、多党竞争的议会制民主。经济上,开启私有化进程,打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外交上,倡导回归欧洲,积极融入北大西洋关系体系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转型与一体化成为中东欧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中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1998年,多数中东欧国家制定并通过了新的宪法。^②匈牙利虽未制定新的宪法,但在1989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对原有宪法作了重大修改。拉脱维亚则是通过决议恢复了1922年独立时通过的宪法。此后,部分中东欧国家曾对其宪法进行过若干修订。但除克罗地亚曾将半总统制改为议会内阁制,以及将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外,其余修订均为更改国名、解决领土纠纷与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等内容,并未对国家的政体进行重大改变。按照中东欧国家的现行宪法,所有国家均实行议会民主制。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平等、普遍和定期的选举产生。以权力分立为原则,中东欧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各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在政党政治方面,中东欧国家相继出台了《选举法》《政党法》《公民结社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政党政治的运作,有效减少政党数量,控制政党频繁变更,使政党政治由混乱走向有序并形成左右翼轮流执政的稳定格局。当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中东欧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波兰、罗马尼亚与捷克实行两院制,其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波黑的议会由民族院和代表院构成;其他

① 鞠豪:《乌克兰危机后中东欧安全局势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选择》,《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5期。

② 黑山独立于2006年,其宪法于2007年10月正式生效。

中东欧国家都是一院制。但总体来看，中东欧国家在政治体制和政党体系上的共性大于个性，也与西欧国家存在高度的相似性。

第二，经济改革。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始于转型初期的“休克疗法”，但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全新经济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东欧国家已经进行了国有经济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和对外贸易开放化的尝试。但因为普遍面临通货膨胀、物资短缺和财政赤字等问题，这些国家依然致力于维持经济稳定，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随着转型初期的动荡逐渐结束，中东欧国家也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首先，构建支撑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推进金融部门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其次，采取多种方式实现私有化，重塑国家的产权制度，并创造新的市场主体；再次，废除国家指令性计划，恢复经济自由，建立市场竞争规则；最后，摒弃能源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改善民生福祉。总体来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两大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则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逐步完成上述转变。但在实践中，中东欧国家往往采取的是上述两种方式的混合。^①

第三，回归欧洲。在剧变之后的中东欧，大规模的国家转型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成为中东欧国家的主要政治和外交目标。在转型初期的动荡中，多数中东欧国家无暇拟定完整清晰的回归欧洲战略，但已经表达了加入欧盟（欧共体）的强烈愿望。从1991年到1996年，波兰和匈牙利（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93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1995年），斯洛文尼亚（1996年）先后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对双方未来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明确，并为中东欧国家后续の入盟进程做好准备。^② 按照欧盟设立的标准，中东欧国家也进行了新一轮的政治经济改革，并先后开启了入盟谈判。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等8个国家有幸成为第一批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在完成各章节入盟谈判、批准入盟条约草案、签署入盟条约与

① 孔凡君：《中东欧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影响因素》，《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鞠豪：《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与欧盟边界的扩大》，《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3期。

全民公投等程序后,这些国家于2004年5月正式成为欧盟的一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赶上2004年的欧盟扩大进程。直到2007年1月,两国才正式加入欧盟。克罗地亚是最近一个加入欧盟的成员国,其入盟谈判也被视为欧盟东扩过程中最为复杂和艰难的谈判之一。直到2011年,双方的谈判才最终结束^①。2013年7月,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西巴尔干5国虽然尚未入盟,但都已成为候选成员国并开启入盟谈判。因此,虽然欧洲化的水平有所差异,但是中东欧国家都已经融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轨道,其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和现代化路径选择也不可避免受到欧盟影响。

总体来看,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和一体化进程是相对顺利的,但各国现代化与欧洲化水平仍存在明显差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2024年有14个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有8个中东欧国家超过2万美元,捷克与斯洛文尼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高达3.3万和3.4万美元。在经济平等方面,只有保加利亚的基尼系数接近0.4(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其余国家都在0.4以下,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甚至低于0.3。在融入欧洲一体化方面,有11个中东欧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和申根区,但只有6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而中东欧国家参与欧盟内部强化合作的数量也要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虽然已经向欧盟和西欧趋同,中东欧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要面对差别对待和歧视性制度安排。

三 中东欧国家对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调整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已基本结束。多数中东欧国家也已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西巴尔干国家虽未入盟,但也不同程度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由此,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2014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欧洲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基于以往的现代化经验和当下面临的新形势,中东欧国家也开始对其后冷战时代的现代化路径进行反思。虽然以转型与一体化为主题的现代化思路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

^① 胡勇:《“欧洲梦”与“欧洲化”: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及其影响》,《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

中东欧国家依然尝试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等不同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微调”，以弥补转型和一体化进程的不足，并体现其对自身现代化路径的反思。总体来看，中东欧国家反思与调整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仿照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其负面性。在国家转型阶段，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中东欧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绩。在经历“休克疗法”的阵痛期后，多数中东欧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其政治制度和政党体系也日趋完善与巩固。这些成绩使得欧盟相信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中东欧国家可以在发展水平上逐渐接近西欧国家，也能够接受和认同欧盟的价值观念与治理模式。^① 因此，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也为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助力。但随着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基本结束，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提供的发展动力也有所减弱，其负面性则进一步凸显。在政治层面，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已经由混乱走向有序。但其制度化水平仍然落后于西欧国家，政治信任度较低与政党合作度不高是各国政党政治的普遍现象。^② 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政党间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共识。随之而来的政治瘫痪和政治僵局也阻碍了政府维持稳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③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更替频繁成为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难题。民粹主义力量的迅速上涨则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在经济层面，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发展实践也遭到了更多的质疑。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开放国际投资的理念重塑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格局，导致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进出口贸易和国外投资，特别是欧盟内部的投资与贸易往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欧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欧盟和西欧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援助力度也因此大为下降。各国的经济低迷波及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从而引发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疲软或衰退。^④ 有鉴于此，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的过度推崇，还是对政府权限和国家能力的强加抑制都在中东欧国家产生了争议。

① 鞠豪：《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与欧盟边界的扩大》，《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3期。

② Vera Stojarová, Jakub Šedo, Lubomír Kopecek and Roman Chytilek, *Political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Search of Consolidation*, IDE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2007.

③ 项佐涛：《阿尔巴尼亚政治转型三十年》，《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0期。

④ 鞠豪：《浅谈“16+1合作”的影响因素》，《欧亚经济》2019年第3期。

第二,回归欧洲和向欧盟趋同的目标有其局限性。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中东欧国家带来了稳定的政治发展环境,也为其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化注入了新的动力。由此建立的社会共识以及文化上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成为国家转型的有效助力。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也因为加入欧盟而有所提升。但遗憾的是,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完全实现中东欧国家向欧盟趋同的目标。换言之,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双方在价值观与社会文化上的分歧尚未消除。一方面,政治与社会文化拥有自身演进的规律,其发展变化往往滞后于制度变革,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欧盟快速东扩的过程中,实现价值与文化趋同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打造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欧盟因为地缘安全等因素放宽了对部分国家的入盟要求,使得这些国家在改革尚未完成或入盟标准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加入了欧盟。而在入盟后,欧洲化就变为一种内在的社会化进程。国家的推动力逐渐减弱,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的注意力也重回国内,转向各自关心的具体问题。许多国家不仅没有完成应有的改革,反而以一种消极或软怀疑(soft euroscepticism)的态度对待后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因为缺乏有效的奖惩手段,欧盟对成员国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这一局面下,东西欧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包括文化与价值理念上的分歧都保留了下来。^①受此影响,中东欧国家也难以在现代化水平上追赶西欧国家。虽然已经融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东欧国家在欧洲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中仍处于从属地位。人口、资本和各类生产要素在欧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助推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使得大量人口,特别是青年群体和高素质人才由中东欧国家向西欧国家迁移,导致中东欧国家普遍面临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等现代化治理难题。此外,在欧盟内部,部分中东欧国家也面临所谓的“差别对待”和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导致其追赶西欧国家的步伐更加沉重。因此,在度过入盟的蜜月期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微妙。

第三,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其独特性。纵观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被动接受到自主探索现代化,从以西欧国家为师到迈入苏联模式,再到转型与一体化时期,这些国家经历了多次现代化进程的中止与现代化道路的转变。

^① 鞠豪:《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与欧盟边界的扩大》,《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3期。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是混合性和非线性的，也有其独特的现代化风貌。从这一角度来说，中东欧国家很难复制西欧国家的成功路径，也不会照搬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东欧国家在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长期扮演适应与学习的角色。高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要求其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虽然回归欧洲、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中东欧国家不应将本国的命运与欧盟的发展完全绑定。此外，中东欧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有师从西欧国家的时期，也有向苏联模式学习的历史。在“向西看”与“向东看”之间的反复变化使中东欧国家带有更多的东方色彩。^① 基于此，中东欧国家并不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也并不相信西欧式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模式。相较于西欧国家，中东欧国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多极化前景与“东升西降”趋势。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东欧国家也抱有更加理性的态度，愿意从世界各国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中汲取经验，也乐于与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开展交流与合作。

基于以上反思，许多中东欧国家开始对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进行新的探索。在倚重欧盟的基础上，中东欧国家开始更加强调本国国情和民族利益，其国内治理模式和外交战略选择也因此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修正。在政治领域，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公开否定以新自由主义为纲领的转轨进程，提出构建非自由民主的国家形态，并强化与建设民族共同体。^② 以此为引导，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积极推动宪法与选举法的改革，强化对媒体和舆论的监管，加大自身对国家权力与社会的控制力度。对于关乎国家利益的关键领域，更是不断推动其再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在市场经济中融入国家干预的手段，并更加关注在经济转型中忽视的社会公正、人道和平等问题，主张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和谐，由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福利责任。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将恢复经济主权视为关键，以维护本国利益的名义启动经济再国有化的进

① 鞠豪：《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特性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马骏驰：《制度、组织与激励——论匈牙利“非自由的民主”》，《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

程，引导国内经济体系与业已建立起关系的国际金融资本脱钩，重新开辟新的资金来源。^① 在外交领域，中东欧国家一直试图提升自身在欧盟内部的地位与影响力，同时，避免将更多主权移交到欧盟各机构的手中。在欧盟之外，中东欧国家开始以一种开放、多元的态度看待世界体系的变迁，它们希望通过外交多元化的努力拓宽本国的生存空间，在赢得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增加自身与欧盟和西欧国家博弈的资本。^② 同时，减少自身对欧盟与西欧大国的过度依赖，保障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由此，中东欧国家采取了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并致力于国家贸易关系多样化的务实性外交，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区域及国际多边合作平台，以寻求从欧盟之外的新兴经济体获得相应的支持。

目前，对后冷战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反思已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有部分国家将这种反思付诸实践，并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不同幅度的调整。但从一个更为宏观和长期的视角来看，这种反思和调整能否上升为区域共识并衍生出一条新的现代化路径仍有待时间的检验。首先，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接连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碎片化程度进一步上升，政府稳定性较低、政府更替频繁的现象越发突出。中东欧国家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调整常常是由特定执政党主导的，一旦其执政地位不保，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就会中断。比如，波兰的司法改革就因法律与公正党的下台而宣告终止。斯洛文尼亚的政治实验也因民主党的大选失利而结束。其次，自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环境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态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原本遭受冲击的安全阈值再一次被突破。安全问题压倒一切，成为主导各国政治的首要议题^③。即便是现代化进程这一重大问题，也必须暂时让步于国家安全。在俄乌冲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无论哪股政治力量都不愿、也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后，中东欧国家的改革与调整仍是局部和微观的，其转型与一体化时期的现代化路径并未改变。过去的 10 多年，欧洲一体化接连遭遇重大挫折。民族国家参与一体化的意愿明显下降，关于一体化模式与未来发

① 宋黎磊：《匈牙利“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评析》，《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4 期。

② 鞠豪：《浅谈“16+1 合作”的影响因素》，《欧亚经济》2019 年第 3 期。

③ 鞠豪：《多速欧洲与中东欧国家的微观一体化策略》，《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 年第 2 期。

展道路的分歧也不断增多。英国脱欧更将这一问题引爆为事实层面的合法性危机。在一体化遭遇困境后，欧盟矢志推进改革，并重新探索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方向和路径。如何应对欧盟的改革与变化将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大议题，也将决定其现代化路径选择是否发生真正的改变。

结 语

现代化的进程从来不是线性的，也不依赖单一的发展模式。从简单的制度复制和移植，到多元化的实验，世界各国充分展现了现代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迥异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塑造了中东欧国家独有的现代化进程。总体来看，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初期探索、独立发展、以苏联为师、转型与一体化四个阶段。其现代化并不是单一和连续的进程，而是经历了数次现代化道路的更替，也带有外生性和内部差异性明显特征。时至今日，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和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也进一步推动了其现代化进程。但因为地区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东欧国家也在总结自身现代化特性的基础上对其现代化路径选择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与此同时，自身现代化特性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结合使中东欧国家能够采取务实与灵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东升西降”趋势日趋明显的背景下，这些国家也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东方，看待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与道路选择。站在中国的视角，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既承载了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美好愿景，也代表了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紧密联结。无论从全球发展、区域发展还是自身发展的角度，中国都有与中东欧国家密切合作、携手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双方理应合作共赢，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走深走实，为世界现代化进程和国际多边合作树立典范。

〔作者鞠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晓航）

Journal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tudies

Founded in June 2025

Semiyearly

Vol. 2

2/2025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Open-Source Paradig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eng Yongnian / 1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Qin Xuan / 6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Underpinning the Theor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ang Jianjun / 14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hina-Argentina Relations in the New Era

Ramiro Ordoqui / 20

Paper

Behavioral Emergence and Social Simulation Driven by “Hybrid Intelligenc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u Bowen & Zhang Runze / 26

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technology, generative AI

is evolving from an auxiliary tool to the intelligence agent.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have already explored the paradigm shifted from the big data background to intelligent era. Subsequentl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tate governance turns out to be a fancy trend. Unlike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ybrid intelligence is demonstrating remarkable capabilities in behavioral emergence and social simulation through its inherent advantages. Across five domains—regional and national strategic simulation, macroeconomic decision-making, critical industrial security early warning, social simulation innovation, and AI driven military sociology, hybrid intelligence supported by novel decision-making infrastructure is presenting new paradigm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ate governance. Furthermore, profound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paradigm shift in nation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intelligent era holds immense significance. In summa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and equal emphasized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Hybrid Intelligenc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y,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Liang Haoguang & Li Yang / 45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practical dilemmas, and innovations approache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e study argues that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s an indispensable spatial carrier and core engin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ming an organic whole encompassing the “goal-pathway” integration. The paper firs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grounded i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and balanced urban-rural progress, sluggish industrial upgrading, uneven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tighten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systems. It then critically analyzes persist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isparities, weak endogenous drivers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uneven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intensify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which impede the realization of truly high-quality urban trajectories. Building on this diagno-

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approach: strategic planning should serve as the guide, driven by dual wheels of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advanc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such as spatial optim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mpowerment,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se approaches collectively facilitate a shift in urban development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connotative enhancement.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deepen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s of majo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the essential goal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t not only provides key leverage for addressing the principal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contributes a Chinese approach to the paradigm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globally.

Keywords: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Modern Cities of the People

The Chinese Path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eng Zhiping & Yue Jinglun / 57

Abstract: Transitioning from a rural-based society to a modern society constitutes a core dimens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a is currently coordinating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foster integrated and shar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the resident population. The people-centered new-type urbanization strategy prioritizes facilitating the urban citizenship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while preserving the flexibility for farmers to mov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a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mphasizes the agency of rural communities.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elps address the long-standing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among farmers.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s to dismantle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organic interaction and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between cities and the countryside supports the complementary aggregation of both “urban attributes” and “rural attributes.” The coexistence of flexible promotion,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and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shapes a new landscape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w era, offer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fresh options for achieving shared urban-rural

prosperity and advancing human modernization.

Keywords: Rural China; Urban – Rural Transformation; Urban –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alysis 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Driver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Provincial Level

Zhao Xijun & Liu Lei / 80

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15 indicators from four dimensions: economy, society,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iming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driver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provincial-Level.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eastern regions taking the lea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atching up,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rrowing economic gaps and dynamic adjustment of gaps in ecolog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emporal evolutio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seven major regions has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 among which the Central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East China regions have achieved relatively fast growth.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ary drivers of provinci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t is concluded that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tems from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social modernization is restricted by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people's livelihood modernization relies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odernization is constrained by the industrial energy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ies based on the endowment conditions of each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and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arrow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Provincial Level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Ju Hao / 96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trajector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 countries has not been linear or singular; rather, it has undergone multiple shifts in development paths. After the Cold War, CEE countries once again stood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modernization. Influenced by global, European, and regional-level dynamics, most CEE countries adopted similar modernization strategies.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became the dominant themes of their post-Cold War development, closely linking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 to the European Union. However,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shifts in global politic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European regional landscape. CEE countries have begun reflecting on their post-Cold War modernization path. Some have translated such reflection into practice, introducing varying degre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These reflections and adjustments highlight the inherent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modernization, while contributing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modernization studies. Yet from a broader and longer-term perspective, whether such reflections and reforms will evolve into a regional consensus and generate new modernization paths remains to be see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on